

# 台州史志

2020年第3期

(总第87期)

《台州史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欠梅

副主任:林明达 许宏志 刘东生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有浙 阮士标 杨华灯

张树荣 陈天云 陈成叶

陈青鸿 陈献之 项锡贵

主办单位:

中共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台州市地方志编纂室)

台州市党史学会

台州市地方志学会

主编:刘东生

副主编:许竞凡 吕永飞

编辑:陶毓 王赞赞

地址:台州市行政大楼1604室

电话:0576-88510609

邮编:318000

E-mail:tzds@zjds.org.cn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印刷:台州市机关印刷有限公司

# 目 录

## 卷首语

凝聚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 3

## 纪念抗战75周年

抗战精神不可或缺 爱国主义历久弥新 ..... 项 燕 4

牢记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神

——黄岩县委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与黄岩军人参加正面战场抗战简述 ..... 陈献之 8

椒江抗战留下的红色记忆 ..... 方根法 14

营救特委书记刘清扬和台属地区国共合作抗日的波折 ..... 罗灵英整理 19

用自己的枪，保卫自己的家园 ..... 林 立 25

揭秘“晴空”号 ..... 吴世渊 29

驷山抗日保卫战 ..... 单露娟 38

安宝将军，我们永远缅怀您 ..... 瞿昌炎 41

温岭民间对日索赔行动的探究与思考 ..... 李幸斐 43

南田收复战役 ..... 陈建华整理 50

抗日烽火下的黄岩县立中学 ..... 章云龙 52

“八一四空战”的揭幕者

——记空军英雄许思廉 ..... 陈建华 周建灿 62

## 简 讯

《台州经济融入长三角（上海）的历史考察》受到市委书记批示肯定 ..... 65

椒江区委党史研究室积极做好农村文化礼堂“四万工程”服务工作 ..... 65

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宣讲到“军营” ..... 66

工作再部署，活动再谋划，任务再落实

——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深入贯彻落实台州市市史志系统半年度工作会议精神 ... 66

# 凝聚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

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中国人民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这一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重大贡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前进道路上，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敢于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警示未来，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奋发有为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铭记历史、警示未来，让我们大力弘扬伟大民族精神。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在这一壮阔进程中，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

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新征程上，我们要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敢于攻坚克难，勇于担当作为，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铭记历史、警示未来，让我们凝聚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面对极其野蛮、极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我们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希望，引领着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方向。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深刻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聚14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节选9月3日《人民日报》）

# 抗战精神不可或缺 爱国主义历久弥新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项 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程，深刻阐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重大意义，强调在新时代要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其内涵之丰富，立意之高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正如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时所

强调的那样：“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可谓掷地有声、铿锵有力、气壮山河。在长达14年的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程中，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无数英雄用鲜血和生命浇铸出民族精神的丰碑。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勇敢地冒着敌人的

炮火共赴国难: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千千万万抗日将士的杰出代表。近期热映的抗日题材电影《八佰》讲述的就是在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拼命抵抗日军的真实故事，把观众带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孤军奋战的英雄团长谢晋元率领400余人的队伍坚守四行仓库，四行仓库紧靠公共租界，是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四个银行设立的仓库。为了虚张声势，迷惑日军，谢晋元对外宣称守军有800人，由此这支孤军又被称为“八百壮士”。

仓库的对面就是外国租界，那里的国人关注着坚守在四行仓库的将士，不顾流弹横飞，为中国军人鼓掌助威，其中一个懂得军事旗号的人，自告奋勇地向对岸打旗号问将士们需要什么紧缺的物质，对方回答，什么都不需要，只要一面国旗。于是租界的童子军团战士、年仅18岁的女孩杨惠敏自告奋勇将一面12尺长的中华民国国旗裹在身上，外面套上了童子军服，冒着战火危险，自公共租界出发成功泳渡苏州河，将国旗送至四行仓库，并获得谢晋元将军的接见。第二

天国旗在四行仓库屋顶升起，日军飞机来回疯狂扫射护旗队，国旗倒下了又被扶起，始终高高地飘扬在楼顶上，极大地鼓舞振奋了守军士气与隔岸观战的民众，并获得当时驻扎在租界内的世界各国媒体之赞扬，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亮剑精神。这是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亮剑精神？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这就是“亮剑精神”。最具有亮剑精神的是电视剧《亮剑》的主人公李云龙，其原型是作者根据我军将领中几个性格鲜明、富有传奇色彩人物的合成体，他们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英雄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敢于“亮剑”，带领人民群众以弱胜强。在抗美援朝中，面对以美国为首的气势汹汹的联合国军，我们志愿军战士敢于“亮剑”，以小胜多。这是因为在人民

军队组建之始——红军时期，我们党就为这支英雄的部队铸注了为了党的初心和使命不患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的“亮剑”灵魂，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的指战员都勇于“亮剑”，敢于横刀立马。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但亮剑精神不可或缺。在大事大非面前，决不含糊，在血脉深处流淌着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的中华儿女必须旗帜鲜明地亮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要在五个方面做到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和丑化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阻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利、破坏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

交流合作、破坏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总之，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毫不退缩，直至取得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同时体现了一种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在这种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经历动荡、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风险和不确定性骤增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必须坚定必胜的信心，要志存高远，砥砺奋斗，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奋勇搏击、迎难而上，勇敢地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



学应变、主动求变，面对逆风逆水，要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勇担民族复兴的时代责任。因为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实际上是落后的农业国同强大的工业国之间的较量。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国家富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我们唯有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行的新成就，才能告慰历史、告慰先烈。为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同胞们要继承和弘扬抗战精神，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征程中，锐意进取、埋头苦干，敢于斗争、善于创造，继续把无数先烈开

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铭记历史、警示未来，抗战精神不可或缺，爱国主义历久弥新。抗战的伟大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到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激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从一穷二白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激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且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作者单位：台州市老干部局）

---

（上接第28页）里才知道是中弹。医治了半年，抱着凳子走了半年，屁股上至今还有疤痕。”（赵子祥，沙门镇安人村人，口述于2009年9月20日）

第三次战斗，除了无辜民众，桐丽乡抗日武装民众无一伤亡，前来援助的岙环保安队班长林维寿阵亡。

当天下午，县长以定邦带着一队人马赶到桐丽，实地观察了高山阵地，对当地队伍兵力部署十分赞赏，

回到县里后多次表扬桐丽民众英勇抗日的事迹。

不久，县政府将此事呈报国民政府内政部，张成土得到部长张励生的传令嘉奖。以定邦县长亲自送来两块匾额，上题“众志成城”“光荣乡里”。

本文参考了《永不退色的记忆》

（作者系台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文化新闻记者）

# 牢记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神

——黄岩县委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与黄岩军人参加正面战场抗战简述

陈献之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武力吞并全中国的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8日，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秉持民族大义，毅然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亿万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谱写了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凝聚起强大的民族精神，形成了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

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为内涵的伟大的抗战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1938年至1945年，日军以空袭及陆地登陆的方式入侵黄岩，给黄岩人民造成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刻骨铭心的记忆。黄岩县委在中共台属特委的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斗争。

## 日军入侵黄岩的简要回顾

1938年至1945年，日军以空袭及陆地登陆的方式入侵黄岩，总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8年9月下旬至1941年4月中旬。这一阶段是日军敌机空袭黄岩的时期，对黄岩城乡各地进行狂轰滥炸。1938年9月24日(农



历八月初一)，3架日机自杭州起飞，第一次对黄岩县城进行狂轰滥炸。从1938年9月24日至1941年4月17日，日机出动8次31架，投弹51枚，对黄岩城乡进行8次轰炸，炸死炸伤平民126人，炸毁、烧毁、震倒房屋383.5间，炸毁大商船、小民船各1艘，炸毁西江闸桥的一部分。

第二阶段是1941年4月中旬至5月初。这一阶段是日军首次从陆地上入侵黄岩时期，县城第一次沦陷。1941年4月19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日军在海门登陆，派遣一支约600人的队伍，由水陆两路进犯黄岩县城。县城沦陷后，日伪军以北门天后宫为指挥部，在城内大肆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4月29日，日军焚毁国民党县党部。4月30日，焚烧县政府、警察局、城隍庙。5月1日，焚天后宫及澄江街商铺。5月2日晨2时，乘汽艇撤回海门，旋下海逃窜。

第三阶段是1945年6月中旬至6月底。这一阶段是日军第二次入侵黄岩，实际上是日军撤退过境黄岩时对黄岩的最后掠夺。6月22日，日军分两路北上，其中先头部队窜抵院桥。各小纵队自西至东横列成五路，鱼贯的小纵队起讫历约一周。五路所经大

致路线：一是十里铺，药山转弯沿方山麓进东门；二是沿三童乡大路入小南门；三是鼓屿转羽山大路入大南门；四是鼓屿转羽山经五洞桥进西门；五是横泾转三洞桥、余家屿、葛村、石柜岙、焦坑、山头舟，去七里。6月29日，日军在海门渡江离开。此次日军过境先后计万余人。这次总计31个乡镇受害户数5400户，受灾房屋366间，有许多人被日军抓走。

抗日战争时期，黄岩人口伤亡总计2491人，其中直接伤亡1189人，其中，死亡799人，受伤390人。间接伤亡共计28人，失踪41人，无法分清伤亡类型的1233人。抗战期间，黄岩财产损失总计2433091元。

日军的侵害不仅造成了黄岩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直接影响了黄岩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由于战火纷飞，国民党黄岩县政府疲于应付，无暇顾及县政建设，该投入建设和发展事业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被耗于战事；社会动荡中，农业生产和高贸往来受严重影响，物资短缺，物价飞涨，造成经济衰退，百姓身陷战乱之中，惶恐不安，生活困苦不堪，许多本该可以实现的希望和梦想被炮火击得支离破碎。可以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既是黄岩人民的深

重灾难，也阻挡了黄岩经济社会的发展。

### 黄岩县委领导抗日救亡

日寇入侵黄岩，给黄岩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共黄岩县委担负起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抗日救亡历史重任。

中共黄岩县委是1928年5月成立的，从成立至1932年解体，历经4年，换过6个县委主要负责人。1938年5月，中共黄岩县委在抗战时期重建，领导全县人民踏上了抗日救亡和革命斗争的新征程。

黄岩县委重建后，首先积极在城关、新桥、乌岩等地发展党组织。在两年多时间里，建立起7个区委和1个特支，全县共发展了65个支部、520名党员。组织的建立健全及党员队伍的扩大，为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创造了条件。后来，县委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和革命活动。

随着日寇的侵略，黄岩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成立，给茅畚小学师生以极大振奋和鼓舞。6月，林泗斋发动师生们召开大会通过了章程和宣言，茅小救国会宣告成立。茅小“救国会”成立以后，林泗斋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学生林珂还在新儿童报上发表的文章。茅小“救国会”成立半年以

后，茅小“儿童参观团”诞生了。参观团于1936年12月正式出发，历时半个月。在海门活动期间，14岁的林珂从容登上元旦庆祝活动主席台，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

抗战期间，中共黄岩县委为了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重视对当地的反共乡保长开展斗争，同时做好基层乡保长和地方士绅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加入到抗日救亡阵营中来。茅畚当地以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乡长叶光远为首的顽固派多次针对林泗斋散布流言蜚语，并撕毁茅畚小学贴在街上的宣传抗日救亡的墙报。林泗斋开展与顽固派叶光远的斗争，迫使他辞去了乡长职务。这时，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牟正非正回家，林泗斋促成他接替了乡长职务。

为了加强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2月，中共海门特别支部指派党员郑国森联络文化界进步人士，筹集资金，在海门东新街开办椒江书店。书店购进《救亡日报》《论持久战》《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社会科学、革命文艺方面的进步书籍刊物以及适合民众夜校的救亡读本教材，开架陈设，任人选购。1938年8月，黄岩党组织在城内东禅巷开办新生书报社。党组织派党员共同负责书报社的

工作，并在书报社内设立了党的联络站。

抗战爆发后，中共黄岩地方各级组织利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颁布战时政治纲领有关减租的规定，在农村开展减租斗争。1939年，路桥区竞存乡下岭村的减租斗争遇到保长赵翠珠的抵制。政工队依据《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据理力争，最后县政府只得同意撤换赵翠珠，斗争取得了胜利。

除了开展宣传外，建立抗日武装也十分重要。遵照特委的指示，黄岩县委书记林泗斋将在西乡山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任务交给了郑国森。7月，中共台属特委军委书记陈阜、军委委员丁学精一同进山，决定将当地群众武装联合起来，整编为黄乐边抗日游击队，对外号称有500条枪。队伍整编后，先后由郑国森、丁学精负责，下辖3个大队。为了解决补给问题，黄乐边抗日游击队决定在福溪的谷湾开设盐店，收购私盐转卖，并设卡保护私盐贩运，从中收取过境税，从而解决了部分经费来源。后来，国民党当局以“妨碍战时经济”为由，下令“进剿”。黄乐边抗日游击队寡不敌众，被迫解散。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黄岩县委还利用国民党政府里的政工队、救亡室开展活动。1938年5月，黄岩县政工

队成立。县长公开招考部分队员。中共黄岩县委决定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组 织，指派党员周思远、陈庭槐等前去报考，结果全部被录取。政工队成立后，黄岩党组织秘密成立政工队党支部，由周思远任书记。1938年8月，新任县长迫于形势，接受中共台属临时特委书记宿士平的建议，设立黄岩救亡室。10月，中共台属特委指派乌岩共产党员祁崇孝任救亡室专职干事。救亡室以宣传抗日救国大计为宗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黄岩的一个重要的公开宣传窗口。

在抗日救亡中，黄岩县委十分重视和关心妇女工作，积极教育和培养妇女干部。1938年下半年，县委书记林泗斋在茅畚浦洋发展了章益坚、章学英等妇女入党，建立了黄岩历史上第一个妇女党支部，章益坚担任女支部的书记。县委十分重视加强对妇女骨干的培训工作。1938年5月，党组织在桐屿陈庭槐家举办了为期8天的妇女骨干训练班，台属特委领导和黄岩县委领导都来讲课、辅导。

广大妇女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持丈夫、儿子参军，做军鞋、缝棉衣、搞义卖，支援前线抗日将士。在抗日烽火中，章益坚、牟仲娥、牟桂芳等参加了新四军，茅畚牟菊明奔赴

延安参加了革命，后来在周恩来、董必武身边工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 黄岩军人参加正面战场抗战

在抗战正面战场上，有近600黄岩人在抗战的正面战场上为国捐躯。其中3位著名的抗日将领值得一书。他们分别是以身殉国的上将军长陈安宝、赴国难浴血沙场的王禹九、碧海蓝天写忠魂的王天祥。

第一位是陈安宝将军。陈安宝是黄岩县横街乡马院村（今属路桥横街）人。抗战爆发后，作为79师师长的他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屡立战功。1939年3月17日，时任第29军军长兼79师师长的陈安宝率部参加南昌会战。3月27日南昌失守，陈安宝率领79、26、预6师及江西保安12团，守卫鄱阳湖东西两岸和抚河东岸。4月22日，南昌反击战开始。27日，日机狂轰滥炸，79师伤亡惨重。5月5日，陈安宝赴莲塘指挥3个师主攻南昌。6日下午4时，敌军一部分已侵入桐树庙西北高地，直接威胁到整个部队的安全。陈安宝急率师长刘雨卿、参谋长徐志勋及身边仅余的特务排向敌人反攻，很快夺回高地。5时10分，在左翼龙里张阵地，将士们与日军展开肉搏战，陈安宝仅带数人冒炮火往前沿督战，途经姚庄中弹壮

烈殉国，战场仅拾回1条腿，终年48岁。1939年夏，陈安宝将军灵柩运回家乡，安葬在家乡横街山。

陈安宝将军是浙江抗战期间殉国的最高级别将领。1940年7月7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晋陈安宝为陆军上将。1983年12月，民政部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陈安宝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

第二位是王禹九。王禹九是黄岩县乌岩区联岭乡王家店村（今属台州市黄岩区宁溪镇）人。1920年，他考入浙江陆军干部学校，后参加北伐。1932年，王禹九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注：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一期，是黄埔军校的学员，受训时间为1932年10月至1933年4月），毕业后任98师中校团副、上校团长，因购买大批进步书籍并与中共上海党组织有联系而被撤职关押。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王禹九获释重任团长。不久，奉命至抗日前线接任第79军76师226旅副旅长。淞沪会战3个月，王禹九屡建战功。上海失守后，王禹九率部坚守常熟，保卫南京。1938年，他升79军少将参谋处长，转战苏浙皖及江西

南浔。1939年3月20日，79军参加南昌会战。激战3天，79军伤亡过半，军部在虬岭陷入重围。27日晨，王禹九率特务连突围，浴血苦战至中午，未能成功，王禹九多处中弹，因伤重于下午牺牲。年仅38岁。次日夜，部下丁保良等抬遗体突围后，安葬于高安县伍桥乡。随后，国民政府追晋为中将。

1984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王禹九为革命烈士。1998年清明节，王禹九烈士的遗骸从江西省高安市伍桥乡迁葬至黄岩九峰烈士陵园，萧克上将亲笔题词“抗日烈士王禹九将军之墓”。2014年9月1日，王禹九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第三位是王天祥。王天祥是黄岩县乌岩区宁溪乡（今台州市黄岩区宁溪镇）人。1923年，他考入黄岩县立中学。中学毕业后，考上浙江省军官团，后军官团归并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在快要毕业时，他见祖国空军薄弱，又转考航空班（即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1931年6月毕业，被美国顾问团选为中国10名教员之一，后任航空第3大队副大队长、代理第4大队上尉大队长，获七等云麾勋章。

“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的次日，

王天祥率领强击机大队为轰炸机护航，袭击黄浦江日军舰船及杨树浦码头登陆日军，首战告捷。8月20日，在返航途中击落1架日机，自己机身布满弹孔，却安全降落。《中央日报》发号外新闻，空军司令部发布嘉奖令予以嘉奖。8月24日，王天祥率驱逐机群掩护轰炸机飞抵上海郊区，遭到潜伏在高空云层中日军机群的偷袭。王天祥率先迎战，击落2架日机，日机集中对其进行攻击，他的战机不幸被击中坠落海中，王天祥身负重伤，不幸捐躯，时年32岁。有个姓戚的老乡在沙滩上发现了其尸体，手上戴有“王天祥”的名牌，由于他家穷，把王天祥的手表变卖后，买来棺材予以埋葬，并在烈士坟头刻上“王天祥”三字。

1946年，烈士遗骨移葬于杭州览桥空军烈士公墓。1984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2015年8月24日，王天祥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铭记历史，实干兴邦。伟大的抗战精神，让我们战胜了凶顽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必将激励我们最终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

（作者系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 椒江抗战留下的红色记忆

方根法

1937年11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委宣传部长张崇文来台活动，介绍林尧、郑国森等入党。12月成立中共台州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台州临工委”)，并帮助成立天台、黄岩、温岭三县工委及海门特别支部。张崇文任台州临工委书记，林尧由黄岩临工委委员兼任海门特别支部书记。海门又恢复了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8月13日沪战爆发后，旅沪知识青年、学生纷纷还乡，以他们为主，10月，海门抗日宣传队“春野救亡剧社”成立。由林匡、贺鸣声、方正中、丁介土、应普汉、张燕六人组成理事会，林匡任理事长，聘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林秋富任导演，借中山路美卫生服装店三楼为社址。剧团陆续排练了《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课》、《青纱帐里》、《中国的母亲》、《罗店秋月》、《烙印》等话剧。11月，春野救亡剧社在海门印山俱乐部作首次公演，中共台州临工委书记张崇文亲临指导。随后，春野救亡剧社在海门、临海、黄岩、温岭等地巡回演出，因演得逼真，感染力强，演出时

盛况空前。每当剧情达到高潮时，常常出现台上、台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动人场面。春野救亡剧社的抗日宣传，推动了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7年7—8月间，根据陈韶奏的推荐，东山中学的董事长黄正逵聘请进步知识分子林尧出任东山中学校长。同年11月，林尧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海门特委书记。1937年12月，特别支部选派东山中学学生李传鉴、李传练、陈振亚、林珂等去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校学习。12月，林尧应粟裕的邀请，与黄岩临时工委书记林思斋一道去山门参观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前后约半月余。其间，他们分别向中共闽浙边区汇报了黄岩、海门党的活动情况。

## 一、中共海门特别支部的建立和它的基层组织

林尧自兼任中共海门特委书记后，在东山中学内开展建党活动。1938年2月初，为加强特支领导，上级派郑国森、郑致平到海门任特支委员。5月林尧任台属特委青年部长、



临海县委书记兼海门特支书记。郑担负建立海门街道支部的任务，并以椒江书店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5月，东山中学发展张燕等五人入党，并建立东山中学支部，张燕任书记，李传春任组织委员，李传练任宣传委员，王福林任青年委员。东山中学支部建立后，海门特支随之撤销。另外，组建海门街道支部，负责在店员及市民中发展党员，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 二、东山中学进行教学改革，成为一所新型的抗日进步学校

林尧自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参观回来后，就以实现国防教育培育抗战干部的“陕北公学”为榜样，以“面向社会、面向工农、面向现实”为办学宗旨，实施“系列教学改革”，把东山中学发展成一所新型的抗日进步学校。随后，林尧辞退了思想守旧的教师，聘请一批来自平阳“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学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来校任教，建立了一支积极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进步教师队伍。为了适应战时教育的需要，学校调整了课程，除保留国文、英语、数学等基础课外，废除公民课，新开设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时事分析等课程，并以《大众哲学》、《论持久战》、《游击战争》等进步书籍为基本

教材，体现以抗日救亡为主线的特色。音乐课则教唱《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童子军课增添战地救护、山地战等内容，以激发学生的抗日热情。因此，东山中学成为共产党在海门的活动中心，是海门抗日救亡宣传的重要阵地，同时成为中共台属特委培养与训练干部的基地。

学校还组织“青年学生救国会”，以演讲、演戏、出壁报、到街上演话剧、办民众夜校等活动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启发人民大众的觉悟，同仇敌忾。

## 三、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台州组织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由进步青年组成的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5月，台州最早的“民先”组织在东山中学成立，“民先”组织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发展对象，同时，也吸收部分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加入。参加“民先”的，东山中学学生有三十余人，随后在台州中学也发展了十多名“民先”队员，郑国森在社会上也发展了三十余人。开始郑国森兼任“民先”队的负责人，后改为王福林。5月底台州“民先”总队部成立，台属特委委员林尧任总队长。“民先”队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动员青年参加新

四军，去延安，一部分优秀队员加入共产党，增加了党组织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民先”组织成为抗日救亡活动中的一支中坚力量。

#### 四、举办青年运动骨干训练班和成立台州学生救国联合会

1938年7月10日至8月20日，在台属特委直接领导下，以办暑期学校为名，在东山中学举办“青年运动骨干训练班”。有台属各县党组织选送的青年党员及进步青年共40名学员。台属特委书记宿士平、青年部长林尧、特支委员郑致平、党外知名人士宋成志等前来讲课，宿士平还亲自为学员讲授政治经济学。“青训班”学员还成立“救亡室”，进行学员自治，民主选举干事长。陈伦选为总干事长，顾顺章为副总干事长。

“救亡室”除正副总干事外，下设墙报、戏剧歌咏、识字三个组。墙报组由顾顺章、周杏荪负责，每周刊出一期，定名为《椒浪》；戏剧歌咏组由李传练负责，节目多由学员自编自演；识字组由王福林负责，在岩屿街、杨家桥、岩头、赤山寺等附近乡村举办民众夜校及识字班。识字班分别不同对象，分工农班、妇女班等，课本由学员自编自印，在学文识字的同时，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训练班既注意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又重

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经常组织学员走上街头，深入乡村，进行抗日宣传。

1938年11月12日，由林尧主持，在东山中学成立“台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到会的有临海女师周杏荪、黄岩简师林珂、温岭县中郑伦等各县学校代表15名，选举陈伦为主席，王福林为副主席，并向延安全国学联发了致贺电。

#### 五、椒江书店的开设与抗战救亡进步思想的传播

抗战开始后，为使广大民众及时了解形势，台州各地在共产党组织领导和支持下，开办了一批进步书店，其中椒江书店的影响最大。1938年2月，中共海门特别支部指派特委委员郑国森，联络进步人士方正中、余天虹、张燕等集资六百元在海门东新街开办椒江书店。椒江书店从金华、上海、温州等地购进进步书刊，其中有《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解放》《群众》等报刊和《大众哲学》《简明政治经济学》《论持久战》《西行漫记》等书籍。书店将书籍开架陈列，免费借阅，专门为读者提供桌凳。并组织进步青年成立读书会、歌咏队，刊出壁报，宣传马列、宣传抗日。继椒江书店开办，台属各地纷纷办起出售进步书刊的书店，它们都到椒江书店来进书。椒江书店因此成为浙东南进步

书刊的发行中心，促进了抗日进步思想的传播，并发挥了人才输送站、革命联络站的作用。共产党组织通过椒江书店，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建立“民先”队，建立中共海门街道支部。并以椒江书店为掩护，为过往的各地党的领导干部提供食宿，为召开秘密会议提供场所。椒江书店成为台州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重要联络站。

1939年2月，因郑国森调离海门，加上国民党特务的干扰捣乱，椒江书店无法正常营业。经特委同意，椒江书店停办，部分进步图书由街道支部书记丁复农负责转移到乡下。

## 六、创办《力行》杂志和建立《力行》剧团

中共台州各级组织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创办报刊杂志，宣传全面抗战路线。1939年1月1日，《力行》杂志创刊，杂志于1938年8月以浙江第七行政督察公署名义筹办，由专署筹集资金，为中共台属特委秘密掌握的刊物。在台属特委的积极支持下，《力行》杂志发表了大量共产党人撰写的宣传全面抗战路线的文章。宿士平、林尧、王槐秋、管听石、梁耀南等共产党人纷纷在该杂志上撰文，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宿士平撰写了《台州农民往何处去》《台州青年往何处去》等文章，提出

巩固后方社会，增强抗战力量和领导青年救亡运动等问题，号召台州各界群起抗日。这些文章说理透彻，使更多的民众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力行》是半月刊，发行的对象为本埠各中小学、机关、团体、工厂、商号等，并发至温岭、黄岩、临海的政工队、青战团及各中小学。到1940年8月共出版30期，《力行》成为当时一份在台州颇有影响的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

1939年7月，筹备成立力行剧团，由力行杂志社具体领导，表面上由专署科长蔡慕慈负责，实际上由共产党员李传鉴控制。1940年，贺鸣声自陕北“鲁艺”回乡，被邀参加力行剧团，任指导员。剧团设在海门乾元观。团员有杨正言、林淑贞等进步青年30多人。曾在海门、葭沚、路桥、黄岩、临海等地演出《阿Q正传》和抗日戏剧（并演唱《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武装保卫浙江》等抗日歌曲）。

## 七、反漏米资敌斗争

1938年11月，海门共产党组织得知温岭大地主张翰庭从温岭将大批粮食运到海门，准备装载挂外国旗号的“神福轮”出口上海，卖给当地正缺大米的日本米行的消息后，立即发动群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漏米资敌斗争。

共产党员郑致平、丁复农具体负责这次斗争。郑致平发动东中、台中

的“民先”队鼓动学生上街示威游行，联合当地爱国教师、知识青年四出宣传，并赶印由方正中等创办的《火炬报》散发张贴，揭露汉奸运粮资敌的卖国行径。丁复农更与街道支部和“民先”队员，深入到工人、船工、洗衣妇中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起来斗争。

当大米运到海门大埠头及轮船码头附近，群众数千齐集码头附近，事先已组织的年老工人、洗衣妇等站在前面，船工及广大市民随后，他们手拿剪刀、小刀、钉子、铁棒等，看到大米包，就冲上去划戳，使大米包全部破漏，米流满地，无法搬运上船。群众还向停泊在码头的神福轮扔石头，神福轮慌忙启锚逃往江口停泊。押运的军警慑于广大群众的愤怒，不敢拦阻，双方相持了数日，终于迫使神福轮空船开走。反漏米资敌斗争取得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奸商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人民利益。

中共海门街道支部自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反漏米资敌斗争取得胜利后，斗志极为高昂，1939年除夕延续至正月初八，日舰数艘驶入港口向市区及外沙开炮轰击，一时人心惶惶。1939年3月，海门街道支部着手组织战地服务团民众分团(简称民分团)。李传炼为团长，丁复农为副团长。共产党员李禹青、叶云飞、石振民、缪希玉

等以群众身份参加为骨干。团部设在海门七区中心校内(现人民路小学)。当时丁复农和党员同志及部分积极分子睡在团部的，夜里在杨府庙(原来是群众说书场)宣传抗日救国。并组织巡逻队，分上下半夜，带着作为自卫武器的棍棒，到大街小巷巡逻，防止汉奸破坏。还组织晨呼队，每天凌晨到街上高呼抗日口号、歌唱抗日歌曲，激发广大市民同仇敌忾。

1940年5月4日，由贺鸣声、方正中、林元白等编辑的《巨轮》木刻集在海门出版。其中所收的木刻作品大多是反映抗日救亡斗争生活。特委青年部长王槐秋为《巨轮》撰写发刊词。8月，海门中心支部在石柱裕广堂开办农业合作社。10月，海门各界召开讨汪宣传大会，声讨汪精卫的卖国行为。会上，决定制作汪精卫、陈璧君跪像，置于城门头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供行人讨伐。1941年4月19日，日军在海门登陆，将该跪像砸碎，扔入旁边深井，并用炸药将抗战阵亡纪念碑炸毁。直到1987年6月，人们才从深井中挖出跪像。汉奸汪精卫、陈璧君跪像现陈列于椒江戚继光纪念馆内。

(作者系椒江区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 营救特委书记刘清扬 和台属地区国共合作抗日的波折

罗灵英整理

## 一、时局背景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为切实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加强浙江全省的统一领导，193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指示，撤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浙江省临时省委。临时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设立浙南、台属等5个特委，并派组织部长谢文清到台州接收台州临工委工作。同月，中共台属临时特委成立，宿士平为书记。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浙江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10月，台属临时特委转为正式特委，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刘清扬任特委书记。台属特委成立后，台属党组织的领导机构逐步健全起来。在中共

台属特委的领导和推动下，台州民众抗日救亡活动走向新的高潮，党组织在台州地区的影响也迅速扩大。遵照当时中共中央大量发展党员的指示精神，台属特委乘机吸收大批工农和知识分子入党，到1939年底，全区建有11个县委，20多个区委，党员发展到2766个。

但是抗日战争一开始，分别代表着不同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国共两党就推行着两条不同的抗日路线。中国共产党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抗日救亡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广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争线。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则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压迫人民的一党专政的基本立场，他们害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超出控制，危及其统治地位，尤其害怕并限制共产党领导人民起来抗战。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开始奉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限制和压制群众抗日的活动日趋严重。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掀起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台州国民党当局也趁机开始频频制造反共事件，台属地区党组织的活动日渐困难，国共团结合作抗日的政治局势开始急转直下。

## 二、不幸被捕

1940年5月15日晚，刘清扬和台属特委常委林尧从天台开会后回黄岩，在黄岩城区樟树下避雨，遭遇国民党警察出巡，刘身上被搜出中共文件，两人同时被拘禁。当时国民党方面并不知道刘、林两人的真实身份。在国民党警察看守下，刘清扬、林尧相互间不能交谈，只好互相用手指在对方的脚底下划字。通过如此“交谈”，最后两人统一了口径：他们互不认识，只因避雨时偶然碰到一起。第二天审问时，两人都装作互不认

识，当问及对方，只说“不知道”。中共黄岩县委得知刘、林二人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派出多名交通员送信特委领导人，并设法营救。经过多方努力，加上国民党当局在林尧身上实在是找不到证据，只好同意让其亲友保释出去。

与国民党打了十几年交道，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刘清扬，当时自报姓名“王以德”，说自己是经商的，身上的信件是别人请他带的，他不认识几个字，不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这才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但其身上所带的文件是中共浙江省委和台属特委的文件，是“异党”证据，不能轻易交保。国民党黄岩警察局又从刘清扬身上搜去的笔记本中查到温岭的几个通讯处，温岭国民党当局依此线索，于6月1日凌晨，分别对竞新小学、泽国阮氏小学、冠山第二小学突击包围搜查，温岭县委委员郑斌、王福林和另外3名共产党员被捕，大批党内文件和33张党员登记表被搜走，温岭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更进一步证明：“王以德”极可能是“异党”重要分子。因此，国民党黄岩警察局将刘清扬列为要犯，并给他上了镣铐，严加看管，准备上解省政府处置。这样一来，给营救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保释刘清扬或帮其越狱都难



以实现。

### 三、筹划营救

既然确定黄岩当局无权裁决，一定会把人上解给省政府，特委领导人商量，那就待刘清扬被押往省政府（当时国民党省政府驻永康方岩）时，组织武装在途径临海、天台两县边界山区时将其救回。从黄岩到永康方岩，要经过临海、天台。因日本飞机轰炸，汽车已经不通，从黄岩到临海有汽轮可乘，从临海到天台有人力船可乘，其余路程都是步行，这是组织营救的有利条件。因此特委领导决定，不论水路还是旱路，都要组织人员在途中抢回。行动地点定在临海与天台交界处，原因一是那里地理条件好，地处深山；二是该区党组织力量较强，群众基础比较好；三是在那里行动后，可以利用临海与天台两县国民党当局相互推诿之际，安全转移刘清扬。

初步营救方案制定后，特委交代临海县委做好充分准备。6月初，警察局内部有消息传出刘清扬即将押往省府，在得知消息后，台属特委和临海县委立即投入紧张的营救工作。特委领导张贵卿、丁学精和临海县委书记杨炎宾、宣传部长郑伯永专程到大石岩坑村，在岩坑中心支部书记孙高英家召开有北区区委和仙人、岩坑等

支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了营救刘清扬的行动方案。会议决定由临海北区区委具体落实，并作周密部署：北区区委委员梁老四组织10人在百步岭守候；仙人村党支部组织6人同县委派出的人员一起，守候在仙人村交通要道上；殿前村支部组织6人守候在临海、天台两县接壤处；下湾村支部组织4人守候在青龙头地方；营救指挥部设在仙人村，由郑伯永负责。会后，大家商定了联络暗号，各支部按计划行动，有扮作放牛的、割草的，有装成砍柴的、钓鱼的，整天守候在必经道路两边，密切地注意着从县城方向过来的行人动向。

就在临海县委紧锣密鼓地张罗着营救工作的同时，黄岩县委继续密切监视警察局内的动向。几天后，中共黄岩县委书记丁学渊又从国民党当局内线得知确切消息，刘清扬将由水路解往临海。黄岩县委派人用事先约好的暗语打电话告知在浙江省高等法院四分院（设在临海）工作的共产党员刘熙春：“货物从黄岩到临海那班轮船带去，请你到码头去接。”

### 四、营救成功

再说，刘清扬被起解前，黄岩警察局为了不引人注目，特地将刘头上的学士帽、身上的长衫、脚上的皮鞋

全部换掉，给其穿上一身旧的短衣，拖着一双旧布鞋。加上刘清扬已一个月没理发、没刮胡子，从被捕时的“阔老板”，变成了一个要饭似的穷老头子。

刘清扬由水路到临海后，在县城住了一宿。当时在临海的国民党军政头目，听说有“共产党要员”要上解省政府经过临海，都想看个究竟。在这些人心目中，共产党人能拉武装，能打游击，一定是个像四大金刚一样的人物，于是摆开“大堂会审”的架势。然而，当他们看到是一个个头不高，穿戴破旧的老头时，都感到惊诧。曾经多次被捕后脱险，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刘清扬，一看这个场面，计上心头，来个“假戏真做”。他立即俯身向地，用戴着手铐的手去捡香烟蒂头，又拿起烟蒂走到这些人面前讨火点烟，吓得他们连连倒退。刘清扬还用满口的闽南话回答问题，谁也听不懂。这场戏演得非常有效，使得国民党临海警察局放松了戒备，以为“王以德”可能真的就不过是个送信的而已。在黄岩起解时，用一个班的武装，到临海住了一宿后第二天启程赶路时，只有两名警察押着刘清扬，且仅配给警棍，没带其他武器。

大石地区参加营救任务的同志们，一连守了多日，不见刘清扬人

影，各路人员纷纷向郑伯永询问：是情报不准，还是他们已另走他路……考虑到当时正值农忙时节，为了不耽误农活，郑伯永通知其他同志暂时撤回，听候命令，待自己去临海城里探明情况后作部署。

第二天早晨，吃了早饭，郑伯永赶往临海。刚走到石佛洋时，看到两个警察一前一后押着一个犯人迎面走来，仔细一打量，犯人正是刘清扬。郑伯永不由得暗喜，终于等来机会了，并且只有两名警察押送。此时的郑伯永机智地背起牛草鞋，装扮成牛贩子，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路，以免引起解差的怀疑。之后，到了一个拐弯处，他马上抄田塍小路折回，气喘吁吁地跑回岩坑村找到孙高禄。很快，他们叫上岩坑中心支部党员孙高暖、孙高清、陈祖义。郑伯永下命令，无论如何，要把刘清扬抢回来。在路上，他们又遇上了另一个村的地下党员梁老五，就这样，成立了5人营救小组。营救小组考虑到上陈横地处临海、天台两县的交界处，如果出了事，天台县国民党政府和临海县国民党政府都可以推卸责任。于是他们就决定埋伏在上陈横并兵岩，该处易于藏身又能看清对方的动向；旁边又有一条小路通到山村，是个理想的营救

地点。营救人员埋伏好不久，就看见两个警察一前一后地押着刘清扬过来了。

眼看他们到了巨石边，营救小组一拥而出：“把我老板弄到哪里去？”当时，押解的人拿起背上的雨伞就想打，梁老五手快，“砰”的朝天一枪，两个警察就跪在地上求饶了。梁老五用枪顶着警察的头对他们喝令说：“这个‘老板’我们请了！”“可以放你们走，只准朝天台方向走，不准回临海方向。”孙高禄叫警察起来，给刘清扬打开手铐，然后将警察训斥了一顿，放他们逃命去了

营救成功后，刘清扬又被安全地转移到粗坑村梁思土家。几天后，再由天台地下工作人员接应，护送到天台欢吞隐蔽起来。

### 五、政治意义

在国共团结合作抗日出现波折的大背景下，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从被捕到到被成功营救事件具有以下几方面政治意义：

一是有力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势力的嚣张气焰。营救行动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逆流猖獗的形势下，中共台属特委直接领导台属地区各县共产党组织，不畏强暴，依靠人民群众，有计划有组织地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势力斗智斗勇的一次重大胜利，

有力地打击了反共势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台属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斗志，同时也惊醒和教育了对国民党抱有过度幻想的同志。

二是充分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台属党组织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开展合理合法的斗争，一定程度上保护与改善了群众的生活，减轻了群众负担，调动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同时，广大群众也通过斗争，感受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他们谋利益的，因而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抗日统一战线开展以后，我党威望日益提高，党在恢复了一批原本失去联系的老同志的党籍外，更是吸收了大批工农和知识分子入党，为此次营救行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三是充分显示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台属党组织正逐步走向成熟。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进攻，台属地区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并未被吓到，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灵活的革命斗争，比如：争取乡保甲长、进步青年和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扩大武装工作队，依靠群众，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必要的自卫；积极开展新地区和恢复被摧残地区的组织工作。此次营救事件正是通过台属特委与临海县

委、黄岩县委、天台县委之间密切地协作，成功保护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四是促使台属党组织进一步转变斗争方式。面对国民党顽固派频频制造反共事件，台属各地共产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日渐困难的事实。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变化，特委遵照中央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对党内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实行单线联系，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分开，严格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特委决定，从政工队退出的共产党员不再参加三青团所属的组织，大批党员自动离队后，安排当起中小学教师等公开职业长期埋伏在群众中，或是转移到新的地方隐蔽起来。

五是激发了台属地区民众的抗战热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行令日本侵略军更加肆无忌惮地大举入侵浙东。由于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影响，1941年4月，日军发动了浙东战役，19日，台州重镇海门失守。之后两日，黄岩、临海两县城相继为日军占领，整个台州地区面临着沦陷的危险。

但是，在中共中央关于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大政方针下，台属共产党组织认真执行党的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勇于开展抗日反顽宣传，积极争取乡村政权，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动员和带领了台州人民广泛开展抗日爱国救亡运动，使台州大地上不断涌现抗日爱国热潮。

（作者系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

# 用自己的枪，保卫自己的家园

林立

旧称桐丽乡的玉环沙门，有过一场英勇的抗日保卫战

即使是玉环人，也未必都知道沙门镇曾经的名字是“桐丽乡”。

1986年之前，这片沿海土地的名字一直在桐林、果丽以及桐丽三个名称之间变更。1986年撤乡设镇，“沙门”的名字没再变更过。

一场英勇的抗日保卫战，就发生在它还叫“桐丽乡”的年月。

那一天，是1945年3月10日。一支日本军队，令人惊恐地出现在桐丽乡灵门港的海域上。

“警报！警报！”

那不是我们的渔船！”

“那天是农历正月廿六，我记得很清楚！灵门村王根德等人发现灵门西南方向的海面上，有两艘木帆船鬼祟祟地跟着一艘捕虾的小船，趁着涨潮，向灵门驶来。王根德是老渔民，他认识这一带所有的船，他知道

那两艘船肯定不对劲。他就跑回村里，向我父亲报告。”83岁高龄的张子训老人笃定地回忆着，“我父亲张成士是当时桐丽乡的乡长。”

张子训老人世居沙门，是如今唯一能再述往事的老人。日军攻击的那天，他才11岁。而所有当时亲历现场的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

1945年，桐丽乡人去一趟县城要走五六十里山路，交通极为不便，是真正的穷乡僻壤，土匪、海盗隔三差五进犯。这么远的地方，政府管辖无力，更无心。

为求生存，当地百姓便自我武装。

他们购买了16支步枪，都是杂牌货，分别是毛瑟枪、套筒、广东造、小口径等型号。这些武器历经多次土匪、海盗的挑战，给了老百姓抗敌的勇气。

得知海上有可疑船只，10多名武装民众闻讯后，立即背着枪支弹药，





张子训老人远远地指向当年桐丽民众抗日的地方。

向上灵门的下跳咀山跑去。他们登上山巅，踞守着有利地形，等着两艘船缓缓靠近。

“嘭！”

王根德开了第一枪。

众人凝神等待片刻之后，一排排子弹连续回击而来，甚至还有榴弹炮。

“不好！机枪！是日本人，日本人来啦！”张子训老人模仿着当时众人的叫声。即使距离那次日军来袭已过了七十多年，他逼真的讲述，仿佛仍能把人带到现场。

张成土得知来的是日军，当即召集南山、安人两村20多名武装民众，跑步冲上灵门岭头，见日军正向下跳咀山疯狂扫射，他迅速将队伍转移到上跳咀山，摆开阵势，投入战斗。

眼看着两艘敌船离灵门滩头只有200多米，20多位武装民众即刻对敌

船猛烈射击。日军的武器占尽优势，他们加大火力回击，武装民众无法有效对抗。如果让日军登陆，身处山岭的他们便无处可退。

两村500多名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就要遭殃了。

紧急时刻，渔民曾广冬大喊：“成士乡长，打掌舵老大！”

猛然醒悟的张成土，举枪瞄准撑船老大，一弹击中他的右手。只见老大抛下舵，躲进了船舱里。

无人驾驶，木帆船随风飘荡，偏离了航线。而另一艘敌船受到武装民众左右夹攻，不敢孤军作战，落荒而逃。

第一场反击战，胜利了。

县长主持追悼，“忠勇可嘉”

张成土带着从上跳咀撤退下来的队伍，和下跳咀的武装队伍汇合了。面对群众的欢呼赞扬，他心沉如水。

他警示大家，随时准备迎接日军再次攻击。

当夜，队员们分批巡逻放哨，警惕任何一个可能登陆的区域。

然而夜空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队员们没发现，日军分乘两艘小舢舨于下半夜从箬岙村山头坑悄悄登陆。

第二天凌晨，巡逻放哨的人未发现敌人动静，陆续回家吃饭。



“我父亲在家吃饭，突然看到山头坑山顶的‘山头根’跑来报信，说日军在他那儿登陆了。”张子训语气一紧，场景又转回当年那凶险时刻。

得到情报后，张成土立即率领章宪寿、张子佩、张孝康、张兆土、章昌土、陈岳明、张扬土、张孙达等10多个武装民众，一口气跑到南山后山的风车斗。

队员章昌土先跑到山顶，伏低身子窥视下面的麦地，他看到日军40多人从小地里角向南山方向走来。

就在章昌土想退下来报告时，日军发现了他，一声巨响，一枚炮弹落在章昌土附近，章昌土幸运躲开，但埋伏在下坎的队员张子佩却被一块飞石击中脑顶，昏迷不醒。

队员们怒火万丈，就要与日军拼命，张成土下令一队人向日军开枪还击，另一队数人背张子佩进村抢救。

由于伤势过重，张子佩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剩余队员中，张孝康头部负伤，章宪寿受了重伤。

由于日军至此还没摸清武装队伍的实力，并未继续进犯，转向了邻村安人村，打算偷袭。令人愤怒的是，正在安人村吃早饭的吞环保安队，听到日军的枪炮声，竟然抛掉饭碗，拔

腿就逃。村里的老弱妇幼逃得慢，被日军枪杀3人、伤6人、掳走3人。

日军进村后，杀猪捉鸡，抢掠财物，并到灵门村也抢去不少粮食。

由于不清楚和他们对战的队伍底细如何，日军不敢久驻，带着抢来的粮食、家具，慌张离去。

“张子佩的牺牲，引起了全县的议论。时任玉环县长名叫以定邦，得知南山张子佩抗战阵亡，亲自赶来组织追悼会。追悼会十分隆重，楚门区各乡乡长、桐丽乡各保保长、教师、学生以及温岭县吞环盐警、学生、保安队士兵等500多人参加葬礼。我父亲代表乡里向张家送了一块匾额，上题‘忠勇可嘉’。”张子训感慨地回忆道。

### 桐丽英勇，光荣乡里

战斗并未结束。张子训提到第三次反击战，语气难掩痛心。

距离日军登陆两个多月，5月25日黎明，日军32人悄无声息地在灵门村登陆。邻村安人村农民赵可德中了日军的子弹。

这位村民心思重，总觉得日军会从灵门登陆，经常来沙滩上探视，没想到真的碰到了日军，被一枪击中肩膀。

赵可德忍痛跑回村里报信，抗日武装民众听信后，集合队伍，讨论战略部署。他们决议，一边在灵门后山

候敌，一边派人到芳杜向以定邦县长和岙环保安队求援。

张成土带领着30多人，向安人村的灯盏坞山岗进发。上岗之后，他们发现与日军距离太远，无法射击。张成土命令陈岳明、张孝宗、张孙达三名射击手，翻到灵门后山，与日军距离拉近到300多米。其余队员由队员张子坦带领在灯盏坞山岗埋伏接应，防止日军切断退路。

此刻，登陆后的日军正在村里抓人、抢东西，强迫渔民搬运抢去的财物，还将四位年轻姑娘掳到船上。

队员见此，一颗颗复仇的子弹不断向日军射去。日军发现岗头有人，立即派出九人冲上山来，试图抢占阵地。

在队员们的奋力还击下，九个日军只好隐蔽在一棵桑树下，其中一人被击伤，不久后即结队逃至山脚。

山岗上的队员乘胜冲下山，此时岙环保安队也从灵门下塘赶来。日军受到三面夹击，来不及搬运抢走的财物，仓皇上船离岸。被丢弃的九个日本兵赶到滩头时，木船早已驶去。他们只好跳入大海，泅水逃回船上，狼狈不堪。

队员冲到滩头，举枪向敌船射击。日军无法招架，只好悬挂起棉被作掩体，勉强抵挡一阵后，迅速逃

离。

那四位被掳的女子后来生还，她们向村人讲述，敌船舱板上染满了血迹，一个日本兵负重伤回到披山就丧生了，另一个送沈家门医治，到半路也死了。

日军的残忍暴虐，给村民留下了永久的伤痕。

在玉环市委党史研究室采写的《永不退色的记忆》一书中，几位亲历日军劫掠杀伤的村民，讲述了让人胆寒的回忆。

“陶文灿是我大叔，他和林树唐、神龙四（绰号）被日军从安人村口抓到船上，叫他们看管从老百姓家里抢劫来的货物。神龙四因晕船，船老大叫他在厨房里做帮厨，这样可以避开日本人眼目，趁机逃走。有军人指着大叔陶文灿和林树唐两人，向同伴做了个杀鸡的手势，日军就把他俩的头活生生地割下抛进海里。这些经过是神龙四亲眼看到，后来告诉大家的。”（陶金梅，沙门镇灵门村人，口述于2009年9月20日）

“我随着人流一起逃难，因天色朦胧，一眼看去模模糊糊的，看看像人又像是松树。我感觉屁股湿漉漉的，一摸都是血，原以为是碰到石头擦破的，后来到医院（下转第7页）

1945年，日军飞机掉落椒江，海军中将山县正乡当场毙命；75年过去，飞机去哪了

## 揭秘“晴空”号

吴世渊



1945年3月7日，海警阮捷成等在椒江口内击毙日军中将山县正乡，图为山县正乡与其座机。

“晴空”号是日本海军第四南遣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山县正乡的座机。（图片由台州市档案局提供）

“1945年，我才13岁，就独自跑到椒江边，在江面上，我见到了一架巨大的飞机。”

88岁的椒江洪家人王奎寿坐在病榻前，讲述自己少年时“看飞机”的那段经历，两眼直放光。

“记得那天早晨，我路过鱼摊，

听葭沚过来的卖鱼郎说，有架日本飞机掉到椒江上，还发生了激战。”

“我好奇心一起，想去现场看看，便问卖鱼郎哪里可以看到飞机？卖鱼郎说，葭沚码头就能看到。”

“于是，我瞒着父母，从洪家出发，一人前往葭沚码头，少年人脚程

飞快，大概一个小时，我就到了码头边。”

—

站在椒江南岸的江堤上，王奎寿终于见到了那架日本飞机：它静静地停靠在水面上，机身大多被苇草、芦席覆盖，只露出个硕大的尾巴，在春日下，泛着银灰色的光。

同在江堤边观望的还有上千民众，当中不乏有“知情者”，七嘴八舌，吐露着飞机掉落后的信息。

王奎寿竖起耳朵听——那飞机是昨日掉落的，从入海口滑行而来。王小娃的队伍，与飞机里出来的日本人交火，打死几个，抓住几个，还有几个潜水逃去北岸了。战斗结束后，附近一些“赖沙”（台州方言，意思是“小混混”）以为飞机里的日本人都死了，就拎着菜刀，爬上飞机，想偷摸些东西，发点“洋财”。谁晓得，里面有个人还留着一口气，



今年64岁的徐良友，在椒江区工人西路的台州水产品交易中心内经营副食品小卖部。1981年的夏天，他和同伴在椒江底发现了“晴空”号。图为徐良友比划着他当时打捞起来的“晴空”号残片的大小。



在葭沚下街附近，杨祖兴指认1957年左右其父亲打捞“晴空”号时的地点。

颤颤巍巍掏出手枪，吓得“赖沙”们四处逃散。因为怕日本人来寻找，警队和附近百姓连夜用苇草把这架飞机遮蔽起来。

这时，王奎寿见有警队押解着俘虏，在江边行走。四名日本战俘耷拉着脑袋，双手反剪身后。一行人走过

葭沚后街，听说要往黄岩方向去。

又过一会儿，天上有轰鸣声响起。“是日本人的飞机找来了！”人群中有人大喊。只见那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十几圈后，似无所获，便飞走了。

王奎寿在江堤停留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因为害怕日本飞机再来会投掷炸弹，他赶忙跑回家了。

75年过去，王奎寿早已忘记“看飞机”那天的具体日期。

不过，通过查阅史料，我们得知，老人口中的“那天”是1945年3月18日。而飞机掉下来是前一日，即3月17日。该飞机为H8K2-L“晴空”号32X型水上飞机（以下简称“晴空”号飞机），是一架水陆两用运输机。

当时坐在飞机里的，有日本海军第四南遣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將——山县正乡。

## 二

1945年3月14日，山县正乡登上“晴空”号飞机，准备从印尼安汶飞往上海，坐在机舱里，他的心情相当郁闷。

1944年以来，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军相继攻占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利亚纳群岛

后，又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了重要军事基地——关岛。

山县正乡所在的第四南遣舰队，负责驻守南太平洋，目的是迎击从澳大利亚反扑而来的同盟国军队。谁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采取“跳岛战术”，绕过日军防守，直接登陆菲律宾。

原本的“铜墙铁壁”成了尴尬的“漏勺”，第四南遣舰队失去了其战术价值。1945年3月上旬，该舰队被取消编制，向日本海域回撤。作为舰队司令官，山县正乡的失意可想而知。

“晴空”号缓缓飞行。它并未直飞中国，而是中途分别在印尼泗水、新加坡降落，为的就是搜集盟军飞机情报，以选定安全的航线和飞行时间。

然而，千般谨慎之下，山县正乡也终究没能逃过这趟“末日飞行”的命运。

3月16日，“晴空”号飞抵海南三亚，降落着水时，飞机底面触礁，稍有破损。3月17日，飞机又起飞，准备去台北淡水日本水机修理厂进行彻底维修，但飞机上的通信士官接到电报，称“台湾正遭美军舰载机空袭”。山县正乡听后，命令飞机转向，直接飞往上海。



正当“晴空”号飞到中国东南沿海上空时，飞行员突然发现，他们与美军战斗机撞了个正着！那是一架型号为PB4Y-1的轰炸机，由美国海军上尉波尔·斯奇普斯驾驶。美机见到“晴空”号，立即准备发动攻击。

“晴空”号是运输机，重装载而轻战斗，防御武装仅有一门20毫米尾炮和两挺7.7毫米机枪。在美军战斗机面前，它就像是个大号的“活靶子”。

日机飞行员见势不妙，急忙转向南飞。美机穷追不舍，在后方用头部和背部的双联炮塔开火，子弹贯穿了“晴空”号。日机不得不用尾炮还击，双方在空中打了一阵子。

由于在追击过程中燃料消耗过大，斯奇普斯没有恋战，他驾驶飞机退出战斗，返航位于菲律宾的克拉克机场。

“晴空”号则伤得不轻，惊魂未定地从福建飘到浙江上空，燃油也即将耗尽。山县正乡当即决定，把飞机开到甬江口镇海水面降落，那里属于日军占领区。

但飞行员不熟悉地形，误把椒江口当成了甬江口，两地太像了——都是出海口，都有山上的宝塔做标识。

就这样，飞机徐徐降落到椒江入

海口内，贴水面滑行过来。正值退潮时分，飞机滑到葭沚镇码头附近，便搁浅在泥涂上，动弹不得。

### 三

“晴空”号前脚落地，后脚海门（今台州市椒江区）当地的海防组织就赶到了。闹出这么大动静，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飞机里的日本人还不明情况，先派出了三个军官下来探探虚实。这三个人乘飞机一旁的小舢板，用手一推，靠上了葭沚岸边的栈桥。他们遇到一个穿棉长袍的年轻人，双方语言不通，用笔交谈起来。

日本人：“这里是什么地方？”

年轻人：“海门。”

“不是镇海？”

“不是镇海，是海门。”

日本人相互看了眼，面露惊慌神色。

年轻人：“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日本人相互商量后，提出：“想吃点东西。”

“可以，请你们上岸来，有吃的。”

“好，我们回去商量商量。”三个日本军官原路返回机舱内。他们想不到的是，刚与他们交流的年轻人，竟

是浙江省外海水警第二大队第六中队中队长阮捷成。

阮捷成，浙江余姚人，黄埔军校第16期生，时年27岁。他从属的第二大队，负责椒江南岸的防御任务；所在第六中队的队部，设在葭沚码头附近。

阮捷成当时正穿便衣巡逻，见有飞机掉下来，便跑来察看。他与日本军官交流时，心中已暗自判断：这些人不是前线打仗的军人，估计是军事机关的参谋等幕僚人员，飞机上应该坐着更高级的军官。一个计划在他脑中形成：先把敌人引下飞机，再来个“瓮中捉鳖”。

待那三个日本军官回到飞机上，阮捷成吩咐哨兵去中队部集合队伍，携带武器前来候命。

暮色降临，水警部队悄然集结，队员们全副武装，还扛来一挺从未用过的重机枪。阮捷成静静等待着飞机里的动向。

这时，他听到远处有枪声响起，且越来越近。一行十几人沿着江堤跑来，有的拿枪，有的提刀，边开枪边大喊——原来是王小娃带着海上护航队的人过来了。

王小娃，本名王莲森，海门人，此前是一支民间武装力量的首领，后

经国民政府收编，成为海上护航队的队长。

“停下来，别开枪！”阮捷成向王小娃等人大喊。但对方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继续朝飞机的方向开枪。王、阮二人分属不同队伍，遇到这样的应急事件，若不充分沟通，很难做到战术上的配合。

很快，飞机里的日本人也拿出手枪回击。阮捷成见状，立刻下令开火。

战斗正式打响。

#### 四

日本飞机所在的位置，是地势较低的水中泥涂；水警队和护航队在江堤上，占据制高点，有地形上的极大优势。人员配比上，中方也要远大于日方。

海防战士们居高临下，向飞机猛烈扫射。日军只能用手枪回击，如困兽犹斗。枪声时而密集，时而稀疏，持续了约一个小时。

突然，飞机内发出两声沉闷的爆炸声，接着，机舱里蹿出火焰，火势凶猛，燃烧了大半个机身。飞机上的回击也停歇下来，浓烟中，有日本军人跳进江里，江堤上又是一阵猛射。

飞机为什么会突然起火？据浙江

省档案馆于1991年公布的史料，日军当时寡不敌众，一边主动举火焚机，一边潜水遁逃。山县正乡则死在了飞机内。关于他的死因，后世有两种解释：第一种，他被子弹击毙在机舱内；第二种，他下令烧毁机舱内的机密文件后，自戕而亡，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椒江潮水渐涨，慢慢淹没了飞机。战斗结束了，以海门海防部队完胜告终：现场击毙九人，生擒四人，己方无一人伤亡。但尚有日本军官逃到了椒江北岸。

阮捷成短暂松了口气，又转念一想：飞机掉在这儿，日军方定会派人来寻找，很危险。他嘱咐人连夜购置芦席，待潮水退尽，飞机残体显现后，用芦席严严实实捆扎，不使之外露。

果然，第二天一早，就有日军快艇与飞机寻来，大概是隐蔽措施做到了位，日军无功而返。阮捷成晚年回忆说，当时的海门武装力量薄弱，日军若来报复，当地军民必遭大难。

日本飞机掉下来的消息一时传遍附近乡里，许多群众跑到现场围观，其中，就有时年13岁的王奎寿。

3月19、20日两天，椒江北岸涌泉乡（今临海市涌泉镇）乡长尹桂元与警察分所巡官侯志成率领警队，分

别在九龙拿珠岩穴内、将军山壁后娘鱼洞内，搜捕发现从飞机上逃下来的日本官兵八名。这些日本人占据洞穴抵抗，被击毙六人，活捉两人。被活捉的人中，有个叫小岛禄一郎的，是第四南遣舰队的主计大尉副官，已经身负重伤，从临海警察局押送至仙居途中，死在了白水洋。

又过了一段时间，日本广播称：山县正乡不幸战死，追晋其为海军大将。至此，山县正乡成为抗日战争中最后一个在中国毙命的侵华日军海军大将。

4月3日，蒋介石在发给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密电中说：“捕获失事敌机情形悉，此次出力人员，悉予传令嘉奖。”

## 五

台州海防部队围歼日军飞机的故事，到这里就算完结。飞机上的人，死的死，抓的抓。那么，这架“晴空”号飞机的命运，又如何呢？

“晴空”号飞机，由日本川西公司打造，其母体二式飞船，为二战时期性能最优秀的大型水上飞机。“晴空”号是二式飞船的运输型号，它的机身分为上下两层，最多可运乘客64人。

战时，日本共生产“晴空”号36架，一般用作岛屿间要员的运输。山县正乡所乘坐的这架“晴空号”，是他本人的专机。自1945年3月16日起，这架飞机先在海南三亚触礁，再遭美军轰炸机袭击、台州武装部队子弹扫射、机内人员焚烧，最后沉入椒江水底。尽管伤痕累累，但飞机的主体结构并未遭到严重破坏。

如此庞然大物沉没在椒江里，难免有往来的船只与它“偶遇邂逅”。1948年4月6日的《工商日报》就刊载了这样一则新闻：“战前曾有敌机一架，为同盟机击伤被迫降落椒江，机内官佐亦为我军击毙，该机遗骸当经打捞，惟未尽净。昨日葭沚渡船老大癞头等十余人，竟又捞获翅铝质金属五十余斤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门当地曾组织人员对飞机进行打捞。原因是，椒江水位低时，飞机翅膀会露出水面，或刚好藏在水面下，经常碰坏附近船只，人们嫌它太碍事了。

椒江区前所街道的杨祖兴先生，是这场打捞的见证人。

“时间大约在1957年夏天，我8岁，刚上小学，参与打捞的是我父亲，他叫杨吕财，是浙江省海门航运公司打捞队的负责人。”站在葭沚下

街附近的江堤上，杨祖兴回忆起那时的场景，“我跟着父亲上了打捞船，在江中，我见到单个飞机翅膀斜斜地穿出水面，颜色灰白。”

下午退潮时，打捞开始。杨祖兴见父亲穿着宽大的潜水服，脑袋上扣着一个圆形金属头盔，头盔上连一根皮管子，腰间系根绳索，前胸后背都绑有铁块。接着，父亲跳入水中。船上有两人往皮管里打气，保证水下的人有足够的空气能呼吸。

当年没有对讲机，船上和水下的人沟通靠拉绳子，水下人操作完，拉几下绳子示意，船上人就把水下人拉上船。

杨祖兴趴在船沿上，等待着父亲回到船上，但父亲迟迟未上来。“轰隆隆”，雷声阵阵，豆大的雨点落下来。船上的人招呼杨祖兴：“小孩，快进船舱里躲雨。”

“我不进去，我爸爸还没上来！”杨祖兴抓着船沿，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儿，父亲上来了。他卸下浑身装备，见儿子被淋成了落汤鸡，忙从船舱里拿出了自己的衬衣，给孩子穿上。衬衣太大了，儿子的小手臂露不出来，杨父就拿剪刀，把袖子剪去了。

“好好的衣服，剪掉袖子做什

么？”同船的人不解。

“小孩子穿着湿衣服容易感冒，我这件衬衣就送给他了，剪坏也不要紧。”杨父淡淡地说。

飞机最后没打捞成功——以当年的设备条件，不可能把这架飞机打捞上来。水下人员对飞机进行了处理，让它不影响船只流通即可。“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因为父亲给我穿上衬衣那一幕，印象太深了。”年逾70岁的杨祖兴说到这里，鼻子有些发酸。

## 六

同样的地点，不同的人马，相隔20多年，又尝试了一次对飞机的打捞。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椒江人徐良友、丁云财、阮宗富等五人，在椒江里以打捞沉物为副业。

“那时家里穷，我们几个水性好，就想着打捞沉在椒江底的松木，去换点钱。”徐良友今年64岁，在椒江区工人西路的台州水产品交易中心内开个副食品小卖部，“1981年夏天，我们在椒江底发现了那架飞机。”

葭沚的老码头，位于葭沚下街的出口，早年停泊着许多松木筏，人们乘木筏与椒江里的大船沟通来往。可一旦台风过境，木筏就被吞入江中，有些直沉水底。徐良友等人的“生

意”，就是把江底的松木捞上来卖钱。

1981年夏日的一天，徐良友等人在船上，用细长的竹竿探知江底的沉物，这时，他们探到了一样硬物。江底淤泥是软的，有硬物，说明有东西。船上的丁云财当即顺着竹竿下水，一查看，居然是飞机尾部的机翼。

1945年飞机掉下来时，徐良友等人还未出生，但这事件经民间口口相传，他们都略有所闻。几人合计：把飞机捞上来试试。

他们的计划看起来很周密——退潮时，用粗绳子一头系飞机尾部机翼上，一头系船上，等涨潮时，水涨船高，借海水浮力，把飞机提上来。他们也照此执行了。

然而，几人远远低估了飞机的重量。潮水涨起后，没一会儿，绳子就“啪嗒”断了，打捞失败。不过几人不是一无所获，绳子从飞机上拗下一块残片，被他们捞了起来。

“残片大概一米多长，是铝制的，银白色。”徐良友比划了一下残片的大小，“后来，这块东西被我们当废金属卖了。”

## 七

亲爱的读者，看到这里，你一定很关心一个问题：飞机究竟在哪？



采访中，杨祖兴和徐良友都先后带着记者来到椒江边，指认记忆中的飞机打捞地点，他们描述的位置大体一致——

葭沚下街的北边尽头，原本是葭沚老码头（当地人称“老道头”），该码头用石头垒起，从陆地延伸出江面，像一条微微向西弯曲的小路。飞机沉没的位置，大抵在老码头正对着的，再稍向西边偏斜的水域。如今，老码头已不复存在，变成了一片平地，上面盖起了冷冻厂和民房。

往事随风，75年来，“晴空”号一直在江底沉睡着，它还会继续沉睡下去吗？

不尽然。

近些年，这架飞机连同这段历史，引起了许多热心人士的注意，政协台州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孙敏就是其中一位。

“2014年起，我就开始关注这架飞机，并与椒江当地的历史专家对此作了一番调查。”孙敏表示，“据我们推测，这架飞机的主体残骸，应该还在原位，只是年岁已久，沉降入了淤泥里，日本大将山县正乡的遗骸，也很可能还在飞机里。”

孙敏清楚，这架飞机是“无价之宝”，它既是日军侵华的罪证，又是

表现台州人民英勇抗战的重要文物，一旦它被打捞起来，将是一个轰动性的“大新闻”。

“建议政府尽快对‘晴空’号飞机打捞立项，由浙江省地质勘查机构确定飞机具体位置，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飞机进行打捞。”孙敏说，“如果打捞成功，台州市可建造一座抗日史迹陈列馆，对飞机进行保存、展览，并向公众开放。”

本文参考文献及书目：《日酋山县正乡毙命亲历记》阮捷成、《日本海军大将山县正乡座机被围歼情况的有关电文》马登潮、《日酋山县正乡毙命椒江口》楼祖民、《山县中将毙命秘话》胡其道、《二战时期日本海军的编制结构与指挥关系述略》黄力民、《椒江抗日战争史迹》政协台州市椒江区文史资料编委会

（作者系台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文化新闻记者）

# 骊山抗日保卫战

单露娟

在临海市东塍镇屈家村的西南面，可以看到一座处于田野、溪流和村庄包围之中的孤山。这座山海拔不足300米，山脉延伸不足两公里。

75年前，一场英勇的抗日保卫战，就发生在这座不起眼的小山包上。

1945年6月28日清晨，5名为日军做向导的汉奸在绉珠村李家北面的白坟一带活动，被守卫在赤殿堂山的屈家自卫队发现，一直跟踪至山脚伏击圈后将他们擒获。从他们口中得知，日军企图进扰屈家村，自卫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那天是农历五月十九，我记得很清楚。”87岁的屈统产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是历历在目，“我还是个小孩，听说日军来了，吓得在

家里大气也不敢出。”

屈统产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屈家村，是如今少数能再述往事的老人。日军进扰那天，他才12岁。而所有当时亲历现场的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

1945年6月下旬，有消息传来，日本侵略军从温州方向经黄岩、海门向临海进犯。其中一支1000多人的日军队伍，由钓鱼亭向大田、东塍方向推进。不久，隔溪、大路头、溪东、



屈统产老人讲述抗日保卫战的历史。



驹山位于临海市东塍镇屈家村的西南面。

绚珠、大房、六房、寺后、上沙、下沙、白石等村庄都有日军进扰。

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恶不作。怀着对日寇的仇恨，东塍各村人民纷纷组织抗日自卫队，抗击日军，保卫家园。

“我们村的自卫队是屈彦泽出面组织的。”虽然当时年纪不大，但屈统产对这件事情还留有印象。

屈彦泽是当地的开明士绅，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他曾与中共地下工作者岭下村支部书记金德寿有过接触，在金德寿的影响下，有着强烈的抗日救国意识。

6月25日，屈彦泽接到东塍农民抗日武装自卫大队的通知后，联络了周边的大房村、东溪单村、岩潭村等几个大村的乡绅，商议集中抗日的的事情。

最后，他们召集民众300多人，分成大房、屈家、千洋、能仁、泄上等自卫队，并详细地作了分工：大房

自卫队负责驻守驹山，扼守制高点；屈家自卫队驻守前门山和赤殿堂山，把守进入屈家村的咽喉；千洋、能仁、泄上等村的自卫队则为预备队，随时增援驹山和各处的防卫。

“我父亲说，那时候大家约定，以驹山顶上的红旗为号，旗在人在，旗收人撤，决心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屈统产老人回忆。

自卫队的武器，主要是大户人家护院家丁自备的枪支和猎户自带的猎枪，还有各官僚家中主动出借的枪支。平时，自卫队员分散在各自居住的村庄，一有敌情就集中起来，接受统一指挥。集中行动期间的伙食，则由各大富户捐献。

“驹山抗日保卫战打响时，300余人集中在屈家村屈氏宗祠里开伙，吃的米和猪肉、酒等，大部分都是从东塍上街村屈映光家里搬运过来的。我的父亲和哥哥就在食堂为自卫队做饭。”屈统产说。

## 二

1945年6月28日，战斗正式打响。

“从汉奸口中得知日军要侵犯屈家村后，不到半个小时，就有一支接近百人的日军小队从绚珠村李家一带向屈家村方向搜索前进。日军到达赤

殿堂山时，我们的自卫队进行了猛烈阻击。日军因为不熟悉地理环境，暂时退回到了绚珠。”

战争一触即发。屈家村的老百姓担心村庄沦陷，开始往大山深处转移避难。因为要留下给自卫队做饭，屈统产就被父亲托付给亲戚，一起前往深山里的山千村。

七天后，屈统产回到村里。他发现村子静悄悄的，连平时叫得很欢的狗都没有声响。

那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从父亲的口中，他知道了当天激烈的战况。

“父亲告诉我，那天下午，日军改变了进犯的方向。驻大房村的一队日军从驷山西侧用机枪扫射掩护，向驷山发起进攻。”说起那场战事，老人情绪有些激动，“当时，守卫在驷山顶的是大房自卫队。与日军的装备相比，自卫队的‘土快一’（方言）和‘套筒’等枪支实在太简陋。虽然他们全力奋战，仍然不敌日军，只能向山北面的西丁、东溪单两村撤退。”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撤退得太匆忙，大房自卫队来不及拔走山顶的红旗。”而前来增援的屈家自卫队，看着仍然高耸在山顶的红旗，认为大房自卫队仍在山顶坚持战斗，于是从驷山的东面奋勇

向山顶冲去。

“敌人在高处，队员们在低处。冲到半山腰时，他们就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火力范围内。”说到这里，老人激动地用手拍了拍桌子，“日本人就用机枪对着自卫队员们疯狂扫射。自卫队员哪里有地方可以躲避，最后屈仁文、屈彦灶、屈统明等12位队员壮烈牺牲，还有4位队员受伤。这些都是我们村一等一的好后生啊，就这样没了！”

在父亲的讲述中，屈统产得知那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半夜。“自卫队一边打一边撤退，因为对当地的地形不熟悉，日军也不敢贸然追击，最后趁着夜色悄然逃遁。”

驷山一战给了日寇沉重打击，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进犯屈家一带。

1984年4月24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为褒扬烈士精神，批准追认屈仁文、屈彦灶、屈统明等12人为革命烈士，以告慰烈士英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本文参考了《东塍镇镇史馆史料汇编》《驷山战歌》

（作者系台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文化新闻部记者）

# 安宝将军，我们永远缅怀您

——为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安宝将军为国捐躯81周年而作

瞿昌炎

陈安宝，一个振聋发聩的昭昭大名；  
陈安宝，一位顶天立地的中华男儿；  
陈安宝，一位骁勇善战的铁血军人；  
陈安宝，一位令敌丧胆的国军将领；  
陈安宝，一位血洒疆场的抗日英烈；  
陈安宝，一位尽忠报国的民族英雄。

将军您文武兼备、胆识过人、志存高远，放飞了一个逐梦军营的青春梦想；

将军您身先士卒、训管结合、恩威并重，带出了一支虎虎生威的虎狼之师；

将军您好学上进、智勇双全、敢作敢为，成为了一名声名显赫的平民将军；

将军您不畏强敌、久经战阵、屡建奇功，写就一部振奋人心的抗日传奇；

将军您爱国爱民、视兵如子、感恩故里，彰显的是一种有口皆碑的家国情怀；

将军您冲锋在前、以身殉国、气壮华夏，诠释的是一种感天动地的抗战精神。

青山不老，将军您虽死犹生；

绿水长流，将军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安宝故居粉墙青瓦、修缮一新，述说着您头角异常、天资聪慧、争强好胜的青葱故事；

安宝广场构思独特、寓意深刻，追思着您戎马一生、南征北战、碧血丹心的烽火岁月；

安宝小学书声琅琅、人才辈出，见证着您铭记师恩、不忘母校、回馈故里的一往情深；

安宝陵园松柏常青、庄严肃穆，饱含着您以身许国、英勇杀敌、取义成仁的浩然正气。

人们忘不了：您徒步千里、风餐露宿、前往南京、从军报国的凌云壮志；

您投身熔炉、就读军校、学有所成的艰难历程；

您蒋桂大战、巧出奇兵、救蒋一命的残酷角逐；

您西安事变、扼守潼关、周旋各方的正确立场。

人们也忘不了：您扼阻金山、身负重伤、带伤指挥的惊人之举；

您游击江南、神出鬼没、重创



日军的不凡战绩；

您喋血庐山、孤军奋战、让敌蒙羞的钢铁意志；

您南昌鏖战、督战一线、壮烈牺牲的血色黄昏。

人们更忘不了：1939年7月3日，从黄岩到路桥、横街连绵几十里，万人空巷，哀声震天，白幡飞扬，冥币如雪，几十万民众自发沿途设祭，迎接将军魂归故里；

1940年7月7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将军久经战阵、夙著勋劳、屡挫凶锋、不幸殉职，追授您为陆军上将；

1940年8月15日，延安党政军各界隆重召开追悼大会，追悼您和其他三位著名抗日将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位共产党领袖亲自为您和其三位著名抗日将领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并号召全国军人学习践行您们那种一不怕死，二不要钱，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到底，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精神；

1983年10月，湖南省人民政府重新公布南岳忠烈祠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您的大名赫然位列其中；

198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您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烈士证书。

将军的一生是壮怀激烈、尽忠报国的一生；

将军的一生是心存大义，追求正

义的一生；

将军的一生是品行端庄，人格高尚的一生；

将军的一生是忠勇奋斗，功勋卓著的一生；

将军的一生是临危受命，光荣殉职的一生。

将军您忠勇笃毅、不畏强暴；

将军您毕生奋斗、苦旅辉煌。

一路走来，您抛洒的是一腔舍身为国的热血；

您奉献的是一颗威武不屈的头颅；

您耸起的是一座国魂永存的丰碑；

您吹响的是一把振兴中华的号角。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81年来您的精神给力圆梦；

81年来您的遗愿助推发展。

81年来我们自强不息，一路奔跑；

81年来我们务实奋斗，赶上时代；

81年来我们风雨兼程，不畏艰辛；

81年来我们翻天覆地，奇迹井喷；

81年来我们雪耻图强，雄风重振；

81年来我梦在前方，前路如虹。

将军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将军您是台州人民的自豪！

将军您的英名与山河同在；

将军您的伟绩与日月同辉；

将军您的精神穿越时空；

将军您的魅力永世留芳！

我们企求您老继续福佑中华；

我们期盼祖国明天更加美好！

（作者系台州市民政局原副局长）

# 温岭民间对日索赔行动的探究与思考

李幸斐

**内容提要：**在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的今天，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这一行动，特别是温岭民间对日索赔行动总想说几句话。我们知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过的近30年历史，是艰辛的跋涉之途，本文试着从温岭民间对日索赔这个小窗口切入，目的想让读者初略了解并不为大众所知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行动一些环节，并进一步了解温岭这个东海之滨的小城，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也曾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加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这一行动，且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保存了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再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前景和意义作一些探讨性的阐述。

中国人素来信奉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天经地义的做人原则，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受害国和战胜国，

理所当然应该获得赔偿。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本着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传统美德，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周恩来总理强调“中国人民是有权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并不等于日本军国主义肆意屠杀中国人民的血债可以一笔勾销。中国政府为了两国的外交可以亮出自己的高姿态，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可以自发向日本政府清算。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是以中国老龄问题研究中心童增等人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提出的，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当时放弃的是国家赔偿，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中国的战争受害者能够而且应该向日本政府及助纣为虐的日本部分企业索要战争损害赔偿。1992年

3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首次表明了“日中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1992年4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赴日访问前答日本记者问时，阐明“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1995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要求日本方面本着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并合理地加以解决，包括给予必要的赔偿”。

### 一、温岭民间对日索赔行动始末

行动的起始：温岭松门、淋川、石塘是日本侵略温岭受害最严重的几个乡镇，据《温岭抗日战争纪实》一书记载，日机空袭温岭共20多次，其中松门就有5次，石塘2次；抗战期间，温岭县受损房屋共4485间，其中，石塘、箬山、钓浜、上马、松门、淋川、龙门等沿海乡镇就占大部分。1992年6月间，松门、淋川两镇的曾合满、林美海、李贤俊、王申等人在上海《报刊文摘》得悉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童增在1991年向全国人大递交要求民间对日索赔意见书，就联名给童增先生写信，把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时在温岭犯下的滔天大罪告诉他，并提出愿意加入中国民间对

日索赔这一行动，为家乡受害父老乡亲讨回公道。

行动的组织发动：1992年12月20日，温岭民间对日索赔征集签名运动发起人金满城、曾合满、王申、李贤俊、泮贤岳、泮明环、林美海等人向温岭县人民政府递交《关于要求民间对日受害索赔征集签名运动的报告》。报告从日本侵略者对温岭人民造成的重大伤害，中国政府对民间对日索赔动向不加限制的政策，以及温岭民间对日索赔的签名、经费、宣传口径口号等问题，并派人向温岭县人大常委会作口头汇报请示。在政府“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精神指导下，曾合满等人自己集资印制《民间向日本政府要求受害索赔的签名表》和《民间向日本政府受害索赔登记表册》。

行动过程中的调查取证及成果：主要针对1941年4月23日至26日日军在淋川、松门登陆后烧杀抢掠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展开调查取证，采取群众自愿签名，受害群众（或遗属）自来登记，并签名盖章，重大的受害事项必须有1至3人证明签名。登记表册是按每个自然村分发的，也就是说在松门、淋川、度升、新华、上马等设调查登记点，对受害

群众进行调查登记。这些调查登记点一般设在居民经常聚集且消息传播得较快的地方，如村里的副食品店、理发店等地方。这些店的店主都主动积极承担起登记点的工作，如分发表册，并按要求答复受害群众的一些疑问，且按时收回登记表。当时虽然离抗战时期有近半个世纪了，但毕竟有许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还健在，大家听说可以向日本政府提出战争赔偿，积极性都很高。曾合满等同志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取证，至1993年4月，收到受害百姓填写的《民间向日本政府受害索赔登记表册》917份，签名表74份，共计签名6000余人。调查结果：淋川、松门一带民房、庙宇被烧共计3000多间，船只被烧80多只，群众被烧死45人，其他财产损失不知其数。初步估算损失共约壹亿美元以上。调查中还在一户人家家中找到日军司令官竹下尼风对此次行动下的手令：“松门至淋川及火烧墩一带，阻碍军事，焚烧枪杀。”日军对温岭淋川、松门一带的烧杀抢掠，罪证确凿。

行动的结果：温岭民间对日索赔行动是全国民间对日索赔行动的一部分，调查来的登记表和签名表也邮给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委员会（筹备组），

再由筹备组统一递交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下面摘录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发起人童增先生和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二战”直接受害者之一高熊飞先生在1992年至1996年给曾合满先生的几封信件内容，从中了解关于温岭民间对日索赔的调查材料的去向。童增先生在1993年12月9日给曾合满先生的信中说：“您们邮来的材料，我早就收到，我们将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一块送到大使馆去，到时会把这些材料复印一份，目前整个大气候对索赔很有利，我们大家必须团结起来，这样才有力量。……”。高熊飞先生于1996年8月26日给曾合满先生信中说：“今年二月份，日中和平友协理事新井利男先生来华访问，到达杭州，我组织了浙江、江苏、福建、台湾等省市的受害者十多人，在杭州中山大酒店开了一个座谈会，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他把材料带回日本去了，但至今还没有听到反应。（你没有来，但材料已带去了日本！）”从这两封信件中，我们了解到温岭对日民间索赔的材料是从两条途径交到日本当局者手里，一是将由以童增先生为代表的中华民间对日索赔委员会把温岭民间对日索赔的材料和全国的材料一起送到日本大使馆。

但遗憾的是这批调查资料是否准确无误地送到日本大使馆，据我手头上现有的资料不得而知。二是由日中和平友协理事新井利男先生把温岭民间对日索赔调查取证的材料带去日本，可新井利男先生是否把材料交到日本当局手里仍不得而知。因为直到现在温岭受害家属仍没有收到日本政府赔偿的任何消息。

或许现在有人要问：当年温岭民间对日索赔行动似乎没有个结果，是不是显得有头无尾了？是的，从材料上看，是看不出结果，应该说至今没有结果，但历史是无法杜撰的，笔者在这里也只能让读者看不到结果了。但是当年，作为温岭的一些普通老百姓所做的民间对日索赔的努力也算是壮举吧。

不过，2015年7月2日，曾合满先生却收到来自台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消息，说台州中级人民法院将代表淋川、松门、石塘等地的战争受害者于7月7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战争赔偿，希望淋川等地受害者联名起草一份委托书给台州中级人民法院，最后考虑时间太紧，台州中级人民法院又于7月6日电话告知曾合满先生说，起诉时间延迟到9月18日。9月18日是否真的起

诉，起诉的结果又是如何，我一直未得到这方面的信息。

行动产生的影响：从现在看，当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行动包括温岭民间对日索赔行动，广义的影响就是对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心灵上的一次安抚。上世纪九十年代，尽管战争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但许多亲历过战争的人仍健在，战争夺去他们亲人的惨烈场面仍深深扎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带着的这份仇恨就像心灵上的一个包袱日益沉重。那这场行动就是把他们身上的包袱卸下来向当年残杀他们亲人的日本政府抛出去，不管结果如何，至少他们也可向死难的亲人一个交代。

另这场行动为研究温岭的抗战历史保存了大量珍宝的资料。一是通过这些资料使研究者对日本侵略者对温岭同胞的暴行有了更深更细的认识。笔者对当年调查取证来的部分“向日本政府索赔登记表册”进行分析，发现日本侵略者当年对温岭同胞的伤害是海陆空全覆盖的：日军在海上杀害温岭渔民、撞毁船商不计其数；采用的方式五花八门，或把船员杀光并抢了船只，或放火将人和船一并烧掉，或把渔船或商船撞沉，还对落水的船员开枪射击。温岭的松门、石塘百姓



主要是靠海而生，其伤害程度当然很大。对于淋川来说，是日军在1941年4月23日至26日登陆时对其造成的伤害，日军放火烧掉大量民房，一部分来不及撤走的百姓或一部分老弱病残者直接被烧死；日军还见人就杀就打，一部分即便逃离了大火也无法逃离日军的子弹和枪托，被致伤致残又无钱医治而死于非命者无数；还有大部分百姓承受不了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伤痛抑郁而亡的。日军的空袭范围广，次数多，袭击面大，对沿海一带百姓造成的伤害更大，大量的民房、庄稼、家畜被炸毁，许多百姓被炸死炸伤。二是为2005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发起“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保存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当年的917分调查登记表册被作为温岭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里的“口述资料”上报到中央，其真实性更大，其可信度更高更强。

## 二、这一运动引发的思考

### （一）战争留给百姓的记忆是永久的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真正走过了71个和平年，每每看到世界各地战火连连的场景时，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深深地感

慨，和平是多么宝贵啊！因为我们都没有忘记，侵略战争曾带给我们的苦难和伤痛，这不是一般的伤痛，这是烈火烤烙着血肉那种彻心彻肺的伤痛。有了这种伤痛的记忆，我们便会更加珍惜和平。

我翻着一张张有点发黄的温岭民间对日索赔登记表，虽然登记表上的字迹参差不一，但每一张都那样工整清楚，且表上的条款清晰，内容详尽，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当时做得是多么认真，他们没有任何报酬，全部义务做着这一切，为的就是伸张民族正义，为中华同胞向日本政府索赔。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场战争结束后近半个世纪的时候，东南沿海几个小镇的几位退休干部，为了向日本政府索取受害赔偿，居然做了这么大的努力，且不谈其结果如何，也够震撼人心的了；而那些亲历战争伤痛的民众，有的曾亲眼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至今问及仍声泪俱下；而那些转述祖父或父亲伤痛者也义愤填膺，可见，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不是时间可以抹去的。中国人民曾遭侵略者蹂躏过的民族的伤痛之心将永远告诫着后人：团结，自强，不忘侵略者践踏同胞的伤痛。民间对日受害索赔是正义的要求，伤痛可以抚平，但历

史不能忘记。民间对日索赔的怒潮是自发的，是被侵略者伤害了的中国同胞伤痛的呐喊。

### （二）民间对日索赔前景仍可期

虽然从1995年至今的2013年，日本法院审理的近30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无一胜诉，直至2014年4月20日，上海市政府通过官方网站“中国上海”公布，上海海事法院依照我国法律，完成了对停泊在舟山市嵊泗马迹山港的被执行人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属“BAOSTEEL EMOTION”轮的扣押程序，以赔偿中国中威轮船公司在“二战”期间遭受的重大经济损失。至此，这起由“宁波帮”陈顺通、陈恰群和陈震、陈春祖孙三代打了26年，执行标高达29亿日元（合人民币1.9亿元）的跨国索赔案终于有了结果，这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首次胜利（2014年4月19日《解放日报》）。于是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前景就更加值得期待。首先是中国公民在国内提起对日索赔诉讼的已成为现实。据相关资料报导，2005年就开始倡导大家在国内提起对日索赔诉讼，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至2014年3月18日，中国法院首次受理掳日劳工诉日企案，标志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迎来了转折点。再者，国家

层面对日本侵华历史的重视再掀高潮：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隆重举行，这场迟了83年的国家公祭正好向世人昭示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无法抹杀，想否认战争罪责，就意味着有朝一日想重蹈覆辙。今年是抗战胜利75周年，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机遇。还得看到，中国民间近30年对日索赔之路，虽然仍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但至少让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进一步认清战争的残酷，越来越多有良知的日本媒体、日本民众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真相，并从心底发出呐喊支持中国受害民众。

### （三）民间对日索赔的重大意义

战争结束已整整75年了，但日本政府内部某些势力对当年的侵略行径仍不思悔改，甚至一意孤行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对中国民间索赔问题以种种理由一味逃避战争责任。2015年4月份公布的已审定的日本中学生教科书中，提出“钓鱼岛”为“日本固有领土”，并修改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在日本政府公开谢

罪的“村山谈话”表述前，加上了“日本政府采取的立场是国家间的赔偿等问题已经解决完毕”一句。面对这样的政治形势，在中国政府作出一系列回应的同时，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就显得意义重大。它向人们昭示，当年中国政府放弃国家索赔，是顾全大局的一种姿态，体现了一个东方大国的威望和大气；但老百姓的对日索赔仍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一者让世界上一一些妄图称霸者知道，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是有序的，谁也不能肆意破坏这种秩序，战争是对人类的犯罪，谁犯了罪的谁就得付出代价。更主要是让日本政府明白，索赔不光是金钱的问题，关键是记住历史，重新审视对别国发动侵略战争这段历史，提醒日本政府对当年发动侵华战争进行深刻反省，从而明确发动战争就是对人类犯罪。既然犯了罪便要勇于承担战争的责任。只有这样，中日之间才会迎来真正永久的和平。我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开展，对中日关系来说，不是负面的，应该是更好促进中日关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民间赔偿问题如果能有个好的结果，这不仅是恢复人类正义和尊严的需要，也是日本重塑国际形象一个重要砝码。

虽然上文一再强调对日民间索赔前景可期，但毕竟还在艰难跋涉阶段，也许其结果并不乐观，温岭的民间对日索赔早已成为历史的一页，当年为之努力的曾合满等人好多已老态龙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温岭也已步入小康，抗战时期受害者后辈们早不把这份经济赔偿当回事，但温岭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毕竟发生过，且早已成为全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一部分，当年调查来917份《民间向日本政府受害索赔登记表册》和74份签名表已成为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统计表的一部分，我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不管结果如何，都会从一个方面揭开历史的真相，让正义之音在人间传播。

（作者系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综合科科长）

#### 参考书籍：

- 1、《温岭抗日战争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2011年1月第2版）

# 南田收复战役

陈建华整理

南田县设立于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七月一日三门县成立，南田县划归三门县管辖，改设南田区，辖南田（镇）、鹤浦（镇）、龙泉（镇）、文山、四都、杏港6个乡镇，范围包括今天象山县的南田岛、高塘岛、花岙岛、檀头山、坦塘岛、渔山列岛等。1952年划归象山县。

1941年4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所谓的“浙东作战”。19日拂晓，日本海军陆战队小林大队与山本中队在象山县延昌、昌国大举登陆，6时许，日寇炮轰石浦，石浦地区即刻沦陷。自“四·一九事变”后，日军经常窜扰紧临石浦的三门县南田区，封锁海面，掠夺财物，扰乱地方治安。当时，南田区政府西撤，该地一度陷入混乱状态，伪维持会应时而生。陈诚接任三门县县长后，积极加强南田区自卫武装力量，巩固区乡政权，以樊岙附近为游击根据地，经常与日军及伪军周旋，随时予以打击，坚守着每一寸土地。但南田诸岛远离三门大

陆，却与日军据点石浦仅一水之隔，直线距离约1海里，汽艇数十分钟可达，故我方在南田工作开展万分艰难。

1943年，原南田县县长胡常瑛投敌从逆，成立了三门湾水陆保安总队，自封总队长，竭力扩充武力，并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自居，接受浙东行政公署的任命，成立伪三门县（后改南田县）政府，并出任县长。自此以后，三门县自卫队驻南田第二大队与日伪之斗争日趋激烈。胡常瑛企图以南田、长街、健康塘（六敖）为三大据点，以南田为其经济供应点，健康塘为其粮食仓库及军事据点，妄想在大陆上立足，再图扩展。

1943年8月下旬，胡常瑛认为时机已成熟，率领伪南田保安队400余名，纠同日军五六十名，并在石浦、东门等地强拉民夫，组成千余人的队伍，挟带轻重机枪各2挺，于8月25日拂晓，分别由鸭嘴头、韭菜湾、湾塘、吉港等四路，向樊岙抗日游击根据地进犯。驻防樊岙的三门县自卫队第二大队于石屋岭一带迎击日伪军。

日伪军妄想占领石屋岭，数度组织冲锋，均遭击退。旋经县自卫队反攻，日伪不支，纷纷向鸭嘴头方面败退，构筑工事死守。次日双方对峙。27日晨，日军自茅洋方向增加援兵，附带钢炮一门、汽艇一艘，遂再度进犯樊岙。县自卫队占据山地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凭险固守。日军迫使伪军作先驱，而伪军畏死不前，日军即以机枪在后扫射，伪军前无进路，后无退路，进退两难，伤亡很大。如是支撑一日，县自卫队第二大队官兵虽斗志旺盛，终以弹药消耗过多，后勤供应不足，迫不得已，转移阵地至樊岙岭头。次日，日伪又向樊岙岭头进犯，此时自卫队已粮弹两缺，为保存主力起见，经研究决定，一部分化整为零，在当地潜伏，其余均撤出南田岛，渡海集中到健跳一带待命。是役，击毙敌伪中队长1名、士兵3名，伤30余名；县自卫队分队长阮盈传与5名士兵重伤。

日伪占据南田后，焚烧劫掠，无所不至，胡常瑛更是兴高采烈，勒迫南田人民缴纳伪县政府开办费500万元，准备实现其“县长”美梦。陈诚县长听到南田沦陷，亲自赶赴健跳部署，指挥反攻南田，决定于最短时间内，乘日伪立足未稳之际，予以反攻。8月31日下午5时，抽调自卫第一大队一个中队，加上原有第二大队兵力，再辅以地方武装琴江、健跳两

个乡警备班，分二路乘船出发，于9月1日拂晓抵达南田，在鸭嘴头、高塘、杨柳三路登陆，分进合击。日伪猝不及防，望风披靡，我反攻部队乘胜追击，当晚即将樊岙、大南田二地攻克。9月2日，反攻部队分路搜索前进，遂将南田全区收复。沦陷不到一周，失土即告光复，南田人民莫不欢声动地，热烈欢迎，为参战官兵送饭递水。三门全县民众闻讯，亦倍感振奋，募集了大量款物，慰劳部队。

南田收复战日伪伤亡惨重，经查明在鸭嘴头海面击沉敌船2艘，毙日伪军50余名，韭菜湾地方击毙敌30余名，另活捉伪中队长曹云振、副中队长林日宗及伪兵14名，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旗帜、照片等战利品。反攻部队也略有死伤。胡常瑛狼狈逃回石浦，一场“县长”美梦为之破灭。

三门县南田区由于靠近石浦，历年遭受日伪蹂躏，尤以此役受灾范围最广，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损失，劫后余生，痛苦不堪。南田收复后，三门县政府一面积极抚恤救亡，拨付粮款，赈济灾难，并吁请省政府予以救济；一面部署武力，加强防务。南田收复战得到了国民党省政府、三十二集团军总部暨军区的嘉奖，分别给予陈诚县长及自卫大队长赵济、陈镕记功表彰。

据民国《三门年鉴》第二、三辑整理



# 抗日烽火下的黄岩县立中学

章云龙



王天祥烈士

在台州教育史上，有一所享誉已久的百年名校——黄岩中学，但也是一所历经磨难的学校。

这所创办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学校，历经书院时期与现代中学时期。在民族危难的抗战时期不得不西迁至头陀下岙崇法寺及灵石书院，开始抗战时期艰难的办学。条件虽然艰苦，但精神不倒，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

灵石书院为同治九年黄岩知县孙熹由灵石寺改设。他在《灵石书院碑记》中写道：

（“邑西北四十五里，有灵石

山，昔孙恩寇海上，屯兵其处，忽有飞石击之去，故名灵石山。故有寺，唐李义山读书于此，有著书堂遗迹在焉。宋绍兴中，谢少卿伋隐此。名所居曰药园，有斫青堂、明珠庵、润畦亭、水芝轩、灵泉馆、挽衣寮、薜荔阶、黄甘坞、白莲池诸胜。文公朱子题诗所谓‘谢公种药地，窈窕青山阿’者也。明嘉靖中，王石斋堂构灵峰书院时，荡舟读书其间，复兴诸兄坊等为六老会，盖其为讲舍旧矣。自明季以来，尽废为寺，名贤遗进，湮没不彰；乡里后进，无所师法。今寺僧以乖妄罹法，宜即此寺改建书院，以存李、谢诸贤之遗迹，使邑西百里之士弦诵其中，民之愿也。余承乏兹土，宣上德，顺民情，作士气，以仰付国家振育人才之至意，固其职尔，其何敢辞爰！即其地建为书院，割寺田若干亩，为师生膏火费，名之曰灵



1944年学生与级任邱竹师先生合影 章云龙提供。

石书院。”（民国《黄岩县新志》）

民国初年，改办灵石高等小学，不久停办。民国二十八年，因日寇飞机轰炸县城，黄岩县立中学迁此办学。抗战胜利后，黄岩县立中学迁回城内，短短七年，创造了灵石书院故址办学史上的辉煌。

1938年八月初一上午7时，5架日机第一次轰炸黄城，黄城十几处被炸；1939年4月，三架日机在黄城上空轰炸；6月30日，5架日机在黄城上空轰炸，损失惨重；日机后又多次窜入黄城上空，对黄城进行狂轰烂炸。两次把炸弹投进黄岩县立中学，一次是1939年7月22日，3架日机飞

临黄城上空低回轰炸，黄岩县立中学“仰山堂”被毁；另一次炸弹投到学校东面的城墙边，炸弹没有爆炸。师生安全面临威胁，学生不时躲避空袭，求学找不到安定的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1938年秋天始，全校一千多名师生逐步西迁到原灵石书院及山对面的头陀下岙崇法寺内上课。开始了黄中西迁灵石的历史，从1938年的秋天到1945年的秋天，整整七年，黄岩县立中学在灵石办学，基本没受战争干扰。

1938年9月，即将毕业的春三年级，单独一个班最先西迁到灵石，正是秋天红叶最美的季节，一群年轻的

学子为求知报国，开始了在西乡分校的学习生活。1939年，高春一年级的学生到达头陀下岙崇法寺内上课，到秋天，高中部全部搬到灵石，初中一年级全部在崇法寺上课，其它年级全部在灵石上课。

灵石寺的大雄宝殿一度是当年黄中学子就餐的地方（后也作过宿舍、大会堂），为扩大饭厅面积，佛像都拆除了，仅留释加牟尼雕像，师生们看到数米高的释加牟尼木雕觉得阴森，就拉倒后烧毁了。当时，饭厅大门上贴着一副对联：“咬得菜根香，尚思天下有饥者；尝将胆味苦，才是世间无敌人。”当年在此求学的校友们回忆，当年进校门后还有二门，上书“时代洪炉”四字，后来为扩大操场面积拆除了。灵石书院原是寺院，房屋不多，上千名学生在此上学，教室不够，于是在山坡上建起了简陋的草棚，四面通风。1941年，下岙崇法寺校区撤销，全部学生均在灵石上课，教室不够，两个班级放在离学校100米远的东岳庙上课，当时庙宇第一进是五间面楼房，楼上是两个班级的同学宿舍，楼下及大殿作为教室，吃饭、睡觉、上课都在东岳庙，作息时间与全校活动均统一。

灵石书院虽处在偏僻的乡村，但

在抗战期间却是优越的学习场所。一是自然环境极佳，荷塘月色、古木参天、小桥流水，营造了安谧的环境，适宜求学。二是远离中心城市，也就远离战争干扰，地理位置优越。1941年4月15日至16日，日机连续轰炸黄城后，企图轰炸灵石，但灵石恰恰在山脚下，周围树林茂密，日机找不到目标，只把炸弹投到浮山庄村一带。三是因为战争扩大，一批北京、江苏、上海、杭州及浙江其它名校的教师南迁，为当时的黄岩县立中学（1939年1月始改为此名）引进来自各大学、中学的大批名师创造了条件。1938年到1945年这七年间，陈熙光、江文炜、牟振飞（正非）、许植方、郑抱天（念北）先后担任校长之职，利用他们各自的优势，引进了一批知名教师。

灵石时期，正是国难当头，学生的学习条件之差可想而知。教室是建在山坡上的简陋的草棚，四面通风，下面是泥土地，上课时教室很安静，但麻雀却在草棚顶上吵开了，雀屎雀尿乱洒，桌上、身上、书本上经常留下这些“小家伙”的杰作。由于教室分散，上、下课及用餐等均以吹军号为令。晚间，同学们点着菜油灯到教室里复习，菜油灯靠根灯草芯浸油发



方秦汉院士中学学籍表。

光，光线昏暗。住的地方是几十人、上百人一间的房间，睡的是双人床。吃的主食是糙米饭，副食是咸菜、冬瓜、青菜、萝卜，早餐稀饭为主，逢年过节偶尔吃点肉、禽、蛋。陈休校友回忆：在大雄宝殿吃饭，条件差，经常出现学生在下面吃饭，顶上的蝙蝠、老鼠在上面拉屎拉尿，拉到碗里，只能抹掉再吃。“最有趣的是早上千人喝稀饭，只听得东西南北喝声四起嘈嘈唧唧，逐步形成有规律的连奏声此起彼伏，这种千人喝粥合奏曲，简直美妙动听极了。”据周云德校友回忆：那时，为了学习英语，买个金属笔尖，将其缚在竹筷顶端，就成了“钢笔”，练习本的纸张，仅比土纸好点。那时，黄岩北门码头只有一艘小汽轮从永宁江直达灵石附近的

潮济，除少数同学乘着小汽轮来校上学外，大多数同学步行数十里路来校上学。

灵石七年，学生们学习的条件不可谓不艰苦，但学习的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学校四十年代开设了初高中

各门科目，开设的科目有国文、公民、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体育、童子军、图画、生物、地理、音乐、劳作。与三十年代其它时期开设的科目基本相仿，但增加了军训的内容。学校实施战时教育，制定训育目标，对学生进行“国防、体格、德性、政治、社会、服务”等多种训练。

抗战时期，名师荟萃。课堂上，教师各有所长，于是，学生各有所得。据校友张友仁先生回忆：管昌侯老师的高等数学是自学成才，他智力过人，能在看不见棋盘的情况下与人下棋，还会吹箫、赋诗（辛敬良校友回忆管老师上的代数、几何，富有启发性，能调动学生积极思维）。喻信厚先生是榜眼喻长霖的长公子，毕业



台

州

史

志

于北大，曾任职京师及江浙几个县的知事（县长），毛笔大字极佳，曾有一闲章：“行走学部礼部，宦游松江浦江。”牟思穉先生国文功底深，北伐时曾任南京参谋本部文书，因北伐总司令蒋介石有一次来视察，见其模样不像军人，叫他立正、挺胸，无奈其驼背难以站直，受了惊吓，回家教书。劳技教师赵绳荪先生教过木工、金工（诸多校友均回忆对赵先生上课与劳技实践印象深刻）。医学常识教师周子序先生，长于中医、针灸（作者注：他翻译的日本医学名著《皇汉医学》等已在国内一版再版，直到几年前国内还有其译作再版，是一位名医，在黄岩沈宝山药房及杭州行医多年，新中国成立后，浙江中医学院曾想聘请其去任教）。陈老师，陈荣辑（作者注：国民党中将，黄中校友）子，教过战地医学知识，后任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院长。干人俊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师。吴文先生，就学复旦大学，后留学日本，教汉语，会写新诗，在书法上更有特色。江文炜先生，思想进步，主张农民运动，曾经被捕过（作者注：江先生被捕后，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亲自营救，专门给当时浙江高院郑文礼院长写信，要求释放江先生，后江先生到

黄岩县立中学任教，1940年8月至1943年7月担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江翼时先生，教语文，曾任名校春晖中学校长。林子仁先生，杭州著名的数学教师，能将枯燥的数学讲得活泼，学生易懂。毛乃琅先生，化学教师，北大学生，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日本学过造纸，教生化学。生物学老师朱子珍是昆虫专家，原在一昆虫研究所工作，他用鸟笼捕捉到许多鸟，分送学生饲养。史丹莱（作者注：英籍新西兰人），英文教师，英国海员出身，擅长画图，后到温州英士大学任教，是百长惨案的目击者。卢承衡校友回忆道：孙一之老师，除教地理外，还兼任训导处工作，组织班上二十多个同学建立了学生社团——“觉社”，意在唤醒我们反帝爱国之情。辛敬良校友回忆道：管听石老师的历史课，侃侃而谈，引人入胜（作者注：管先生少时师从国学大师管香定先生，年轻时曾因疑其共产党被捕，1931年下半年至1932年上半年，任杭州民生中学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因掩护地下党被省政府逮捕，出狱后任扶雅中学校长，1936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37年返乡后与林泗斋交往甚密，与许杰等参加骆耕谟主持的省文化救亡大会。1938年创办抗



日剧团，1940年担任台属文化党团书记，1942年在暨南大学任教，1943年因叛徒出卖被捕，1944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任黄岩县立中学教务主任兼授历史课，组织“书报读写会”，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黄中有一批学生在那时投奔括苍游击队，1949年6月后在南京及台州农校工作，1952年调浙江师范学院即杭州大学前身，任历史教学法研究室主任，著有《历史教学法》等著作。）朱子珍老师的博物课，阐述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印象深刻。解箴言先生，是前清的“拔贡”。许植方先生，是我国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药成份的先驱者之一，

在国内外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作者注：许先生二度担任黄中校长，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医大一级教授，科研成果曾获实业部一等奖，1957年错划右派）。杜秉正先生，原北京大学教授（作者注：杜先生1947年后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授，翻译经典英语文学作品和编撰英语教材，在国内学界享有盛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主编全国高校试用教材《英语》，长期为中央电视台和全国数十所高校所用，并是许多科研机构职称考试的必读教材，发行量达数百万册，主编的综合性大学英语系列教材《语法与练习》曾获全国高等学校第



宋成志老师编导的《农村曲》剧照。

第二届优秀教材特等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国80%高校使用这套教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主编的《英语美语句型变换》，为英语语言文学研究做出开拓性的贡献，培养了中科院院士黄志镗、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等一批知名学生)。牟振飞先生，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作者注：毕业于北大，曾就职过北京大学、天台中学等校，也曾担任过茅畚乡乡长，与林泗斋交往甚密，解放后就职浙江省卫生学校）。英语教师许天虹先生，曾翻译英国名著《大卫·科波菲尔》。吴学洲先生，香港人，教授高中英语。王天叙校友回忆道：叶国品先生把他们班六十位同学的名字根据音调巧妙编排，点名时朗朗上口，像散文诗一样美妙动听。他教的语文，选择鲁迅、巴金等名人作品，讲得生动。陈器尘老师的数学课轻松活泼，同学们称他为“卓别林”。历史老师戴秀庭，自编讲义，同时教我们手心并用。缪永华校友回忆道：宋成志老师，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兼附中校长（作者注：宋先生1931年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35年参加“乙丑读书社”，曾是《大夏周报》主编，任教大学国文，1948年出版五幕话剧《欢乐图》，得到郭沫若、田

汉、柯灵等支持，是一位剧作家，解放后还担任过师大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邱竹师老师，解放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主任，主持编写过高中历史课本，他与侯外庐合编的《中国思想史》四卷本，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学术著作。徐世康校友回忆道：中文教师解箴言、朱笑鸿、朱希晦、沈见谷、牟思诸先生，他们生于清季，虽无大学文凭，却学富五车，古典文学造诣很深。许雪樵、李树德两位老师（作者注：李老师抗战胜利后一度在上海市财政局任科长），曾先后任教务主任，博学多才，誉满杏坛。林子仁、王贵屏两先生，被誉为数学泰斗。张奇镇校友回忆道：黄中毕业的校友许植方等回校任教，江文炜校长带来了安定中学一批名师，台中杜天縻等一批名师加入，王育和（作者注：王先生曾在上海从事左翼新文化运动，和鲁迅先生过从密切，《鲁迅全集》中多次提到其名字）等名校的名师，李树德、杜秉正、袁积诚（作者注：解放后任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王曰诤（作者注：王先生到黄中前已是大学副教授，1946年后到浙江大学任教授）等一批学者来到黄中，黄中可谓良师云集，极一时之盛。据童航寿校友回忆：那时，学校

管理也极为严格。每天清晨，军号一响，人人起床集合，参加升旗仪式，值班老师点名，教导主任训话。早餐后学生自习，晚上有晚自习，值班老师还要查到，凡缺席者，均被记上大名，有时教导主任张刚先生亲自提着火油灯检查，每日课程排得很满。学生就餐时，值日领导亲临现场，让值日学生班长喊“立正、稍息、开动”的口号，学生才拿筷吃饭。

那时，也有学校组织的讲座。周炳琳校友（时任教育部常务副次长）回乡，朱有瓚先生留学英国回来，王亮（希隐）先生、许璠云先生（作者注：王亮，北大校友，民国时曾任秘鲁国加里约领事，根据其父王彦威资料整理成《清季外交史料》，蒋介石等为其作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外交著作。许璠云，北大校友，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温州市长）来黄，学校专门请他们为学生作报告，扩大学生视野。加上学生勤奋，教学质量很高。1943年7月，高中学生参加全省高中毕业会考，一举夺魁，荣获全省第一名。其中，张友仁、吴全德两位学生分获第一、二名，全国所有大学由他们选择。他们均选择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名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并在以后分别成为我

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中科院院士。从此，黄岩县立中学名声远播。

课堂教学充满着知识的力量，课外活动也丰富多彩。每学期举行一次运动会，规定每个学生至少一项，最多不超过三项。比赛分田赛、径赛，田赛的项目有：跳高、撑杆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垒球（女子）、标枪、手榴弹掷远等。径赛的项目有：50米、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以及200米、400米接力赛跑，全校师生参加，并编《快讯》宣传。1942年，比赛放在头陀区中心小学边的头陀区操场举行，司令台上写着醒目的对联：

黄舍萃青年，正橙黄桔绿，田径称雄，努力来参运动会；

秋原堪极目，喜气爽天高，山河在望，凯歌待听曲江涛。

这副对联是国文老师朱希晦先生的大作，意在鼓励有为青年参加运动会，在田径场上称雄，将来为报效国家驰骋沙场。

学校还重视音乐、美术、体育、书法等课程，定期举行比赛。那时，课外活动也有相当一部分由学生会组织，由老师指导。如球类比赛、歌咏、朗诵、演讲、作文、书画等，还

组织了书报读写会、编辑《日新》日刊、文虎（灯谜）会及文艺演出等活动。课外的戏剧活动也引人注目，剧作家宋志成先生导演的《雷雨》曾在黄城演出，十分轰动。据林仲良校友回忆：宋志成先生为黄中导演的一部大型歌剧《农村曲》，1945年上半年在灵石本部演出，1946年春在城关大会堂演出，主要内容为农民遭受日寇蹂躏的悲惨生活，歌颂广大农民抗日的热情。演出由学校乐团伴奏，有十几位同学参加演出。各界人士竞相观看，座无虚席，盛况空前。陈休校友回忆：文艺演出经常是师生同台，如《丁大夫》《烟苇港》《绯色网》等，朱天宽、邱竹师、李树德诸老师经常参加演出；王育和先生演奏的琵琶妙不可言，凡是小节目形式的文艺晚会，都要请他上台演出；张教官表演的国术《醉八仙》，引得掌声阵阵；赵师傅的硬气功，七块砖头，轻轻一击，分成两半。文艺晚会中，同学们有拉二胡、京胡的，有吹口琴、吹洞箫的，有独唱、合唱，也有小品、舞剑、口技及京剧表演等等。文虎（灯谜）会由学生会举办，许多谜面由师生创作，十分有趣。如“不落伍”（打本校老师名），不落伍就是刚合时。谜底是：江翼时。“次子最贤”

（打本校同学名），谜底是：林仲良。

那时，学校也有各种社团。如孙一之先生组织成立的“觉社”。学生会主席林仲良同学组织的“啸社”，意为仰天长啸于灵石山谷，长大后以身报国。军训时，军训教官定期把高中学生带到雁荡露营拉练。童子军教练组织初中生野外露营。培养学生守纪、吃苦的习惯。军事教官既教学生战术，也搞实战训练。如1940年、1941年、1943年均拉练到雁荡。1943年，童子军教练陈定华先生率领童军徒步雁荡，每个学生身背被服，腰悬日常用品，乐队带军鼓、军号，历时一周，行程三百余里。

灵石七年，培养了一批国家栋梁。如王启东（原全国人大常委、浙江省人大副主任，浙江大学副校长、教授，1939年秋黄中毕业）、池志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药物学家、原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药物研究所研究员，1939年黄中初中毕业）、吴全德（中科院院士、著名无线电电子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41年春高中毕业）、张友仁（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1943年春黄中毕业）、方秦汉（工程院院士、著名桥梁专家，1944年春黄中毕业）、鲍仲平（国家技术监督局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许多国家标准的制订者)、邵荷生(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摩擦学会名誉理事长，1941年春黄中毕业)、黄履中(曾任上海民政局党委书记、市委政法委委员，1941年春黄中毕业)、孙家平(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司法部研究员，1944年春黄中毕业)、潘明友(东北师大、复旦大学、华东师大教授，教育部地理教材编撰委员，1945年黄中毕业)、柯纯(浙江大学教授、中国工程图学会常务理事、浙江工程图学会理事长，1945年黄中毕业)、吴全忠(中国矿业大学教授，1945年黄中毕业)、黄志镛(中科院院士、著名高分子化学家、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46年春高中毕业)、吴梅筠(华西医科大学教授、著名法医学家、博士生导师，1946年春黄中毕业)、辛敬良(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46年秋高中毕业)、刘麟(武汉大学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研究员，1946年春黄中毕业)、杨春龄(大连海运学院教授、研究生部主任，1947年春黄中毕业)、章奇顺(南京大学教授，1947年春黄中毕业)、张文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47年春黄中

毕业)、黄美恭(芝加哥市政府公共工程局工程师、美国威州第一美印公司新色制版公司董事长，1947年春黄中毕业)、叶春华(复旦大学教授、新闻系主任，1948年春黄中毕业)等等。

灵石，黄岩西乡的一方办学圣地，抗日烽火下的黄岩县立中学已远去，留给历史的是一段记忆，一段台州教育史上的奇迹。

(作者系台州教育文联副主席、台州教育作家协会主席)



# “八一四空战”的揭幕者

——记空军英雄许思廉

陈建华 周建灿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人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具有“台州式硬气”的黄岩人民，为之献出了许多英雄儿女，创造了许多彪炳青史的英雄业绩。尽忠报国的陈安宝将军、屡建奇功的王禹九将军、舍身成仁的王天祥烈士等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在橘乡大地几乎家喻户晓。殊不知还有一些人物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鲜有提及。直到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有一位黄岩人

的事迹才在全国各大网站、报刊上频频出现。这个人就是王天祥烈士在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的学生许思廉。

许思廉（1909—2013），浙江黄岩人。1909年出生于黄岩沙埠一个叫南岙朱村的大户人家。父亲经营着烟酒、糕点生意，家中人丁兴旺，有7个儿子、4个女儿。其中长子许步云，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科，历任南昌、九江地方审判厅推事，江苏高等检察厅检察官，上海地方检察厅检察官等职；五子许康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曾任黄埔军校炮兵教官、吴淞要塞司令、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中央军官训练团炮兵训练处处长等职，1935年起任长江江阴要塞司令，成为抗战期间著名的

“黄岩三炮台”之一。1940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高级参谋，1942年辞职回乡。许思廉就是家中最小的儿子。1916年开始先后就学于启明小学、樊川学校。1929年6月黄岩县立中学校毕业，此后曾进入浙江大学就读。1930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学习。中央军校是南京国民政府设立最早的军事教育机构，创办于1928年3月，直隶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兼任校长。1931年转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学习。中央航空学校的前身为1928年11月成立的中央军校航空队，随后建立军政部航空学校，1931年4月迁杭州笕桥扩大改组为中央航空学校，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航空署。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养空军人才，有“中国空军的摇篮”之称。许思廉因此成为中国空军最早一批飞行员之一，高志航、刘超、张远北和王天祥即为其飞行教练。航空学校毕业后，许思廉曾任空军飞行教官、侦察组长、中队长、大队长、航空委员会教育处科长、航空委员会第三处处长。著名的“八一四”上海空战就发生在其任中国空军暂编大队35中队队长期间。

1937年8月14日凌晨，华东沿海一带正值台风过境，长江中下游及苏

浙两省笼罩在一个巨大的低气压下，这一天的上海大雨倾盆，风速竟达每秒22米。就是在这样的恶劣天气里，位于南京小营的中国空军指挥部在12个小时内连发两道作战命令：13日下午2点，令驻扎在华北地区的中国空军各大队南下参加淞沪会战；14日凌晨2点，令中国空军各轰炸大队在上海及附近水域的重要目标据点实施连续轰炸。也正是因为这场台风，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在5点30分取消了6个半小时以前发出的空袭令，“在天气好转之前，暂停空袭”。长谷川清没有想到，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的中国空军却在暴风雨中准备出击了。8月14日早晨7点，中国空军暂编大队35中队队长许思廉率领的5架“可塞”式战斗机，是最早出现在上海上空的中国战机。这支由笕桥航校飞行教官组成的突击队，从杭州起飞，在云隙和日军高射炮火网中，袭击了设在上海日商公大纱厂内的日军军械库。14时20分，许思廉再率3架“可塞”战斗机，“每机携带三十五公斤炸弹四枚，于倾盆大雨中自笕桥飞上海，轰炸公大纱厂，经过汇山码头时，停于该处之敌舰五六艘，用高射枪炮向我射击，但仍从容飞达公大纱厂上空，依次单机俯冲投弹，均命中

该纱厂棚屋，投弹后安然飞返笕桥。”（余子道、张云著《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中国空军在这一天共出动轰炸飞机76架次，分8批集中轰炸了上海日军司令部、弹药库、登陆码头，以及停泊在黄浦江的日舰，炸伤日海军驱逐舰1艘，炸死炸伤日军官兵无数，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年轻的中国空军由此勇敢地成为淞沪会战的揭幕者。“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会战称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时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的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里对此作了解释。“八一四空战”的胜利，是中国空军首次对日空战大捷，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斗志。对于中国空军这一辉煌胜利，中共延安的刊物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文章。年轻的中国空军，竟然将木更津、鹿屋两个闻名于世的主力航空队装备最新式的轰炸机消灭过半，在日本引起震惊，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为纪念这一次辉煌战史，1939年9月，国民政府采纳《航空杂志》读者建议，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1942年，许思廉率队赴美受训。

1949年去台湾后，先后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联勤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1957年7月至1960年2月任台湾空军指挥参谋学院第14任中将校长。退役后，发起成立台湾黄岩同乡会，为首任理事长。后移居美国洛杉矶，2013年逝世，享年104岁。

## 《台州经济融入长三角（上海）的历史考察》 受到市委书记批示肯定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台州不是旁观者，而是主角。“以史为鉴、更好前进”。近期，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欠梅从历史沿革的维度，分“台州早有‘小上海’之称”“割不断的密切联系”“好风凭借力”“唤起新梦想”“扬帆再启航”5个方面，全面梳理台州经济融入长三角（上海）的脉络，

形成《台州经济融入长三角（上海）的历史考察》一文。该文受到台州市委书记李跃旗“向史而新，接续努力”的批示肯定。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认真学习领会，进一步理清思路、坚定信心，凝心聚力、振奋精神，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奋力开创全市史志事业新局面，为建设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作出应有贡献！

（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 椒江区委党史研究室积极做好 农村文化礼堂“四万工程”服务工作

椒江区委党史研究室积极参与农村文化礼堂“四万工程”工作，注重用党史内容引领红色文化。按照市委党史研究室与椒江区委宣传部的统一安排，7月15-16日，研究室全体人员冒酷暑，结合建党纪念活动，走访海门街道、下陈

街道等12家各种类型的农村文化礼堂，面对面进行党史宣传，赠送党史书籍，指导文化礼堂建设，着力在农村文化礼堂培塑红色基因，融入更多的党史元素。

（椒江区委党史研究室）

## 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宣讲到“军营”

9月9日上午，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献之应邀到黄岩人武部“永宁守备营”训练场宣讲党史。近两百名将要启程入伍的新兵受到一场生动的党史教育。

为了讲好这堂党史课，对新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课件以大量的图片和感人的实例，讲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代史，再从五四运

动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共党史。在讲中共党史时，还穿插讲黄岩本地的党史，让新兵了解家乡、热爱家乡。

讲课现场效果很好，每一位新兵都分组列队进场，听课非常认真，听课时还都记笔记。不少新兵说，这样的党史课很生动，听后增长了不少党史和军史方面的知识，受益匪浅。

(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

## 工作再部署，活动再谋划，任务再落实

——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深入贯彻落实台州市史志系统半年度工作会议精神

8月10日上午，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在台州市史志系统半年度工作会议精神。会议重点传达了学习了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室）主任李欠梅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李欠梅充分肯定上半年全市史志工作取得的成绩，并着重分析当前史志工作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对下半年全市史志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安排并提出了明确要求。温岭市委党史室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及时召开

会议部署安排，对温岭下半年党史工作及明年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等具体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谋划再落实。重点突出温岭党史第三卷编纂、党史宣教、革命遗址保护、农村文化礼堂服务、党史资料数字化、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等目标任务有效实施、扎实推进，为温岭党史工作不断向前发展，为打赢经济发展翻身仗，加快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建设作出党史部门新贡献。

(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